

内容提要

马建忠是天主教徒，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著名的改良主义思想家。本文通过研究马建忠的生平，体现出这个人物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尤其强调特殊的身世对其思想和行动的重要影响。同时对马建忠的改良主义思想作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总结，将其思想分为经济、外交、海防三个方面，并结合时代特点予以历史地具体地分析。另外，通过对其人物关系的研究，展现了这个人物的活动全貌。该文把马建忠的思想纳入近代中国的百年发展历程中，考察那个时代赋予当时人的历史使命和马建忠对时代提出的不同问题的解答，分析其思想发展之成因和特点，从而试图对马建忠的思想做出较为适当的历史定位和评价。

关键词：马建忠 天主教徒 改良主义

Abstract

Ma Jianzhong is not only a Catholic but also a famous reformism thinker in China's modern history. This text embody form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is personage's thought through studying his life, and especially emphasized that his special origin have important influence on his thought and action of life experience. The article has done a more intact summary to Ma Jianzhong's reformism thought, divide his thought into three respects of economy, diplomatic, coast defense, and give the concrete analysis according to the era characteristic. In addition, through the study on its personage's relation , have represented this personage's activity overall picture. This article bring Ma Jianzhong's thought to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a century in modern China, investigate the historical mission that the era give the people, and the answer on this problem of Ma Jianzhong, analyze his thought's origin cause of formation and characteristic of development , try to properly evaluate the historic position to his idea.

Keyword: Ma Jianzhong; Catholic; reformism

中文摘要

兴起于十九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的洋务运动，在晚清社会引起的重大变化之一，就是促使一批近代中国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的形成。作为一个早期改良派的代表人物，马建忠对中国如何走向富强的道路作了种种探索。他的思想是标志着十九世纪下半期进步思想发展的界碑，也是探索者走过的足迹。同时由于马建忠与西方宗教之间的联系，又使其思想和活动具有特殊性。因此，本文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对马建忠的生平和思想展开研究。

绪论部分，首先概述了近代中国社会改良主义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并着重分析了改良主义思想与洋务运动密不可分的联系。学术回顾部分，将建国以来对马建忠的研究依据时间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五六十年代、粉碎“四人帮”以后、九十年代和 2000 年至今，总结了每个阶段的主要成果和显著特点。接着，按以上四个研究阶段进行详细分析，介绍了部分学者重要的学术观点。最后指出，自五十年代至今，在对马建忠的研究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引出本文的写作目的。

第一章，描述马建忠的身世和教育背景。马建忠的祖先早在明代利玛窦来华后不久就信奉了天主教，延续至马建忠这一代仍是虔诚的信徒，其兄马相伯在近代中国天主教史上的重要地位早已被公认。由于出生于天主教家庭这样的背景，马建忠得以进入天主教会创办的学校学习。早年的教会学校教育，为他打下了深厚的学识基础，也对他后来的人生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退出教会后，马建忠以随员身份留学法国，法国的学习生活扩大了他的视野。在西方先进文明的熏陶下，马建忠逐渐开始形成改良主义思想。同时他还作为大使馆的翻译，参与了一些重要的外交活动，锻炼了外交实践能力。

第二章，阐述马建忠在晚清政府参与的三件外交大事。第一件大事，马建忠受李鸿章之命，赴南洋处理鸦片专卖问题。尽管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马建忠此行没有取得理想的结果，但是他关于禁止鸦片贸易的一些观点具有积极意义，并且留下了记录印度社会的宝贵资料。第二件大事，马建忠三赴

朝鲜，处理朝鲜与美英德等国订立商约的活动，并妥善处理了朝鲜“壬午兵变”产生的不利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日本对朝鲜进一步的侵略。第三件大事，中法战争爆发前，为了保护招商局的财产免受法国劫夺，马建忠主张与美国旗昌洋行进行“售产换旗”。此举不被清政府和当时民众理解，认为他为了个人利益出卖国家财产。马建忠冒着杀身之危承担责任，后来顺利收回的事实证明了他这项决定的正确。

第三章，分析马建忠的改良主义思想。马建忠在晚年出版了文集《适可斋记言记行》，其中《适可斋记言》部分集中反映了他的改良主义思想。本文根据《记言》的内容，结合马建忠的实际活动，把他的改良主义思想分为三个主要方面：经济思想、外交思想和海防思想。其中，经济思想可以分为税收思想、对外贸易思想和引进外资思想；外交思想包括外交政策、外交人才和近代外交理念；海防思想主要体现在重视海军体制和制度的建设、提高海军教育水平和将士地位，以及积极筹措资金发展中国海军。此外，还从总体来论述马建忠的思想在近代中国改良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重点提出其经济思想的丰富和政治思想的薄弱，以及造成这种结果的两个重要原因。

第四章，具体分析马建忠交游的三个重要人物。这三个人物分别是李鸿章、马相伯和梁启超。马建忠一生都在李鸿章的幕府中活动，他的成功与失败与李鸿章密切相关，李鸿章既是他走向成功的阶梯，也是导致他失败的重要原因。马相伯是马建忠的哥哥，他们曾经一起为李鸿章效力，共同经历患难荣辱，可以说是一对“难兄难弟”，而且在晚年共同完成了语言学巨著《马氏文通》。马建忠晚年在上海隐居之时，梁启超在上海办《时务报》，与马氏兄弟是邻居。梁启超早就景仰马建忠的才学，所以向马建忠学习拉丁文，并通过马氏兄弟认识一些重要人物，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为维新派的支持者。

第五章，根据马建忠一生的际遇分析两个重要问题。第一，他的教徒身份在近代中外文化冲突十分激烈的环境下，对其仕途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尽管他早已退出教会，可是仍然受到传统封建士大夫的排斥。马建忠的一生都在摆脱宗教背景对他的影响，但还是不为主流社会接受，在一定程度

上还成为晚清官场斗争的牺牲品。第二，作为一个近代人物，马建忠的身上体现出部分晚清知识分子共有的矛盾心理，即中西文化的交汇对他们的思想产生的影响。作为接受科举教育的知识分子，他表现了传统知识分子的特性，即保守性；而在教会学校学习的西学知识和留学期间西方文化的熏陶，又使他的思想呈现开放的特点，尤其是经济思想，首先提出开设银行和利用外资的思想。这矛盾的两点使他在思想的先进和行动上的落后产生了很大的反差。

结语部分指出，在近代中国改良主义思想史上，马建忠虽然不是一个彻底的改革家，但也为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因为马建忠身处于一个新旧社会变革的大环境中，所以他身上的局限性不可避免。在马建忠身上所体现的矛盾性和悲剧命运，并不是他一个人的特例，而是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的。

绪 论

中国近代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是出现在十九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传统社会上层的早期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时代思潮。它反映和代表了正开始形成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社会新兴势力,主张用和缓渐进、暂时不作根本变动的办法,来改革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以抵抗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这一思潮的发生发展及其与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封建主义思想的矛盾和斗争,是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到革命民主主义兴起前这一大段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主要内容。

十九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的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潮有其直接的先行者。按其阶级基础、思想源流和理论形式,应该追溯到十九世纪上半叶。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第一次与西方文明正式接触,而号称“天朝上国”的大清王朝却在所谓“蛮夷”的坚船利炮前彻底失败。这一惨痛的事实深深刺激了近代中国一些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林则徐、魏源等人第一次认识到东西方之间的差距,并开始考虑向西方学习,他们开启了中国知识分子认识西方、学习西方的先河,这些人就是近代中国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的先驱者。

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的真正产生和出现是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叶,它首先表现为一种要求政府重视发展民族资本的经济思想。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上层的一些封建官僚从实践上开始中国的自救运动,即洋务运动,这项运动在七、八十年代达到了高潮。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旗号,网罗了一些懂得“洋务”的知识分子,开始举办中国最早的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迈出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第一步。然而,这些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活动却只停留在器物层面,即他们认为只要学到了西方先进的制造技术,就可以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是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包括少数洋务派的上层官僚和许多参与改革的“洋务”知识分子,在实践中意识到这种指导思想错误性。他们认为,中国不仅要学习西方技术,更要学习西方的制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学到西方文明的精髓。这些人在思想上已经超越了洋务派的范畴,成为近代中国早期改良主义者。他们大多数都与洋务派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者是洋务派官僚,或者是洋务派的幕宾。这批先进的知识分子,

对洋务运动有亲身经历和感受，但却逐渐脱离洋务思想原来的方向和轨道，以现实主义的态度，提出了一些更为切实合理的主张和建议。这些主张和建议客观上开始表达了当时中国社会新兴经济力量的要求。

伴随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萌芽，产生了一批早期的改良主义思想家。在中国近代史上，马建忠是与薛福成、郑观应、王韬等齐名的著名改良主义思想家。有关马建忠的学术研究，自建国以来就开始，发展至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其中以年代为根据，大约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是马建忠研究的起始阶段；第二阶段，八十年代，是马建忠研究的重要发展阶段；第三阶段，九十年代，是马建忠研究的成熟阶段；第四阶段，2000年以后至今，是马建忠研究的深入阶段。

四个阶段都有一些主要成果和特点。第一个阶段，也就是建国初期，对马建忠的研究着重于宏观方面，一般都是从整体研究马建忠的思想，经济方面的思想已经有专文叙述，但对他生平的介绍还没有。而且研究成果数量有限，在报刊上和论文集中仅有四篇左右专门论文。这一时期还有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对马建忠历史地位的评价，在从事这项研究的学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分歧。第二个阶段，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对马建忠的研究开始由整体转向局部，对马建忠的经济思想尤为重视，还在《文汇报》上展开了一场关于马建忠是否重商主义者的讨论。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开始了对于马建忠生平的初步介绍，并发表了一篇他的南亚之行的专文。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刚刚从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学者们虽然敢于发表一些比五六十年代进步的观点，例如对其利用外资的思想给予了肯定，但是仍有一定的局限性。然而，从数量上看，已经有一定进步，约有七篇研究性论文发表。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不断发展的阶段，对马建忠的研究也从单纯的经济思想扩大到了外交思想，尤为重要的是开始注重对同时期人物的横向比较研究，而且人物关系研究也有一定进展。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学者们的眼界逐渐开阔，对于历史人物的研究也与现实联系起来。同时，善于从人物之间的比较找出人物自身思想的特点，表明历史学界开始重视比较研究。虽然从研究成果的数量上看，并没有比第二阶段有明显增加，但是理论性水平有所提高。另外，权赫秀等人对马建忠与朝鲜的关系也做了专门研究。第四个阶段，即是从2000年至今，这是一个正在走向深入的阶段。就其已经取得的成果来看，是比前三个阶段

都要丰富的。迄今为止（2000—2004），已经发表研究性论文 12 篇。这一阶段对马建忠的研究的重点已经由经济思想转向了外交思想，而且还把对马建忠思想的研究扩大到了海防思想。自此，关于马建忠改良思想的研究已经包括三个主要方面，即经济思想、外交思想、海防思想。此外，对其生平的专门研究也有所突破。因此，无论从数量上看，还是从质量上看，对马建忠的研究在最近这个时期已经有了飞跃性的发展。

在对马建忠研究的初期，即第一个阶段，对于这个既为洋务派服务，又具有改良思想的复杂人物的评价，争论比较激烈。五六十年代的学者对此问题各抒己见。石峻等认为，马建忠是洋务派直接培养起来的官僚知识分子，在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和洋务运动的腐败逐渐暴露的刺激下，提出了保护贸易的关税政策，提出了“富民说”，这样，就在思想上和洋务派有了区别，但是界限还是比较模糊的，他把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希望寄托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身上，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汤照年对马建忠的经济思想作了进一步发挥。他认为，马建忠的“富民”主张，是积极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反对洋务派压制民族资本发展的“求富”政策。马建忠还具有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要求的重商主义思想。他极端重视货币的作用，强调发展对外贸易，主张实行保护关税政策，这都具有反抗资本主义的要求，同时也反映了早期改良主义思潮由侧重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和生产技术向重点学习西方资本生产经营方式过渡阶段的思想动向。总之，马建忠是具有爱国思想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试论马建忠的经济思想》，《文汇报》1962 年 7 月 20 日）杨炳廷的看法有所不同。他认为，马建忠的经济主张是进步的，属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但他的政治态度是保守的，是洋务派的谋士。他并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活动能力，只是企图说服他所依附的洋务派头子李鸿章，进行某些自上而下的改良，结果反而被李鸿章所驱使。在鸦片问题上，在朝鲜问题上，在出售招商局轮船的问题上，在向美国财团借债的问题上，他基本上都帮助李鸿章进行拍卖和投资。后来他曾想办工厂企业，到处碰壁，一败涂地。马建忠由学洋务而成为改良主义者，充当洋务派大官僚的幕宾，终于未能上升到大资产阶级集团中去，退而以闭户读书解嘲，这就是马建忠走过的道路。（《论马建忠》，《开封师范学院学报》1964 年第 1 期）

粉碎“四人帮”后，史学工作者对马建忠是否重商主义者展开了讨论。黄清根认为，马建忠使我国第一个比较系统的应用近代经济理论来探讨现实经济问题的第一个人物。他首先提出富民是富国的中心和主要出发点，又是富国的基础和标准。怎样富民？马建忠认为，一是支持和扶植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二是发展对外贸易；三是借外资，以兴办各项事业。这种富民思想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一种新精神。过去论者认为马建忠的主张只是重商主义是不够妥切的，因为，马建忠不仅重视商业，更重视把发展商业同发展工业、农业和畜牧业紧密的联系起来，既注意流通领域，也注意了生产领域。（《试论马建忠的富民思想》，《文汇报》1984年7月2日）钟祥财认为，马建忠在以贸易致富等一系列问题上，诸如建议扩大土地耕种面积，要求增加在国外畅销商品的生产，强调大力发展棉纺工业等都和英国重商主义者托马斯·曼的观点完全一致。（《马建忠是晚期重商主义者——同黄清根同志商榷》，《文汇报》1984年9月17日）黄清根对此作了答辩。他认为，西欧重商主义是十六至十七世纪盛行于英、法等国的一种经济流派，而马建忠的富民思想是鸦片战争以来地主阶级改革派革新思潮发展的产物，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迥然不同。（《再谈马建忠的富民思想》，《文汇报》1984年11月2日）

进入九十年代，对马建忠研究的重点集中在近代人物的思想比较研究。王双认为：沿江三大家——王韬（江苏吴县人）、马建忠（江苏丹徒人）、薛福成（江苏无锡人）的经济思想，有着极为相近的共同点以及承续与发展的关系。王韬是“商本”思想的首次提出者，他认为要大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才有可能支持和带动全社会走向富裕。马建忠对王韬的“商本”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展，他特别强调外贸在国家经济中占头等重要的地位，认为外贸是国家财富的来源。而薛福成的“商本”思想更多的倾向于产业投资和发展民族工业生产。沿江三大家都提出以西方先进国家为榜样，彻底改变中国传统经济观念，对促进我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近代沿江三家的商本思想——王韬、马建忠、薛福成经济思想探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03期。）俞政的论文虽以“论马建忠的经济思想”为题，但是在分析马建忠的思想同时，也对马建忠与严复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比较。他认为马建忠和严复都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致富之路（经济学说）的进步思想家，马建忠找到了重商主义，而严复找到了亚

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他们之间的重大差别如：是否赞成“金银为富”论，是否赞成“重征进口税”，是否提倡自由竞争，其实就是重商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分歧。（论马建忠的经济思想，《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03期。）谭群玉和曹又文合作的文章，将洪仁玕与马建忠的维新思想进行了比较。洪仁玕与马建忠共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背景下，要完成反侵略、求富强的相同使命，维新思想自有相近之处。然而，由于二者所处的具体时代环境、身份的不同，他们的维新思想又各具特色，主要有三点区别：一是空想性和可能性的区别，洪仁玕的思想具有早熟和空想色彩，而马建忠的思想具有实现的可能性，尽管这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在当时未变成社会现实；二是角度和程度的不同，洪仁玕的维新思想主要从宏观角度，对建立新型国家提出总体设想，全面但浅显，而马建忠则从微观角度，对开铁路、借外债等实际问题提出个人建议，具体而精深；三是侧重点与表达方式的差异，洪仁玕的维新经济思想，侧重发展内向型即国内资本主义经济，而马建忠则更重视发展对外贸易，即外向型经济，其发展资本主义的目的也主要是与外竞争。（洪仁玕与马建忠的维新思想比较，《历史档案》，1998年04期。）

2000年至今的马建忠研究，又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对马建忠在外交上的思想和活动给予重视。谭群玉总结出马建忠参与的几项主要外交活动，并认为作为李鸿章的亲信幕僚，马建忠在晚清涉外活动中起过一定作用，实际效果则毁誉参半。他经手的鸦片增税专卖、中法交涉主和及“暂售”招商局船产、米建威计划等外交活动所引起的种种争议，反映出社会转型期，接受新知的先觉者与守旧士大夫之间的观念冲突。这种观点突破了过去对马建忠外交活动持否定或怀疑态度的说法，从比较客观的角度评价了马建忠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的积极作用。（马建忠的外交活动，《中山大学学报论丛（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03期。）蒋文野也对早期研究者对马建忠从事外交活动的评价进行了反思，认为过去的研究中肯定了他在语言学研究中的贡献和在经济、外交等思想上的进步性，但是对于他的外交活动总有一点“汉奸”的阴影影响着人们。蒋文野认为，马建忠对朝鲜问题的正确处理有利于朝鲜内乱的迅速平息，有利于维护朝鲜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而马建忠与美国旗昌洋行“售产换旗”，则保证了中法战争期间轮船的正常行驶和战

争物资的供应，和议成功又及时收回了招商局的财产。因此马建忠是一个优秀的外交人才。（马建忠生平专辩二题，《镇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01期。）二是对其生平的研究更加深入，主要是对马建忠在留法期间的史实重新进行考证。权赫秀认为，马建忠在1877年至1879年间留学法国的具体史实，国内外相关论著的记述互有歧异，问题主要集中在马建忠所留学的学校及其所学习课程和所取得学位等两个方面。文章主要依据日本著名中国近代政治外交史专家坂野正高教授的相关研究，对以上两个问题进行辨误。并着重指出，马建忠在为期两年的留学法国期间，所获得的学位只有一个巴黎法科大学的法学学士学位。至于其它各相关论著中所谓“博士学位”及其他各种学位，可以说都是以讹传讹的错误记录。（马建忠留法史实辨误二则，《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01期。）三是开始研究马建忠的海防思想，这是马建忠军事思想的具体体现。薛玉琴认为，马建忠通过对《法国海军职要》的编译，大体勾勒出了法国近代海军建设的全貌。留法回国后，马建忠又以《法国海军职要》为蓝本，参与北洋水师的筹建，这对李鸿章编练海军产生了重要影响。1882年冬，马建忠写了《上李伯相复议何学士如璋奏设水师书》，系统阐述了对发展新式海军的意见。这份上书更多的从制度方面着眼，目的是想通过李鸿章去影响清朝当局，以便建立比较完备的近代海军军事体制。在他的影响下，李鸿章确实采纳了他的一些建议和意见，最终于1888年编练了一支我国近代化的海军舰队——北洋舰队。（马建忠与近代中国海军建设，《史林》，2002年01期。）王如绘对马建忠海防思想影响力的评价，比薛玉琴的观点更为具体和客观。他认为马建忠的海防思想肯定对北洋海军的建设发生过很好的作用，但是他的很多观点并没有被清政府甚至李鸿章接受，比如他的设立水师衙门的主张，清政府虽然于1885年成立了海军衙门，但是它的组成与作为与马建忠的设想大异其趣：再如马建忠提出正确看待中国与西方海军的差距，不盲目自卑，找出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观点，是十分积极而有益的。中国当时如能采纳马建忠的这种观点并实行海军九年发展计划，就不会有甲午海战的惨败。这说明马建忠的海防思想在实际中并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试论马建忠的海防思想，《东岳论丛》，2003年01期。）

虽然，对马建忠的研究起步较早，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已经逐渐成熟

并走向深入，但是还有些方面未臻至善。尤其是多数学者虽然在研究马建忠的改良思想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对马建忠的教徒身份一直讳莫如深，而部分天主教学者对他的研究又带有宗教情结。所以关于天主教对马建忠的影响，现在仍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通过以上对四个阶段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对马建忠研究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对马建忠思想和活动的研究，没有一篇比较完整的总结性论文出现；二是对其生平的研究始终有所欠缺，即没有十分重视家庭背景和教育经历对其改良思想形成的重要影响；三是没有对其改良思想和生平活动做出较为全面的理论性总结，使人们对这个近代改良主义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有更深入的了解。因此，本文力求从这三个方面着手，使关于马建忠的研究有更进一步的发展。然而由于本人疏学浅，且有部分材料未能搜集得到，论文的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

第一章 马建忠的早年经历

马建忠身处于中国近代历史的特殊阶段，即传统与现代的转型时期。他的特别处就在于：他既是接受了天主教洗礼的教徒，也是反传统地向西方学习的改良主义思想家。尽管马建忠对于天主教信仰的持守是短暂的，但是综其一生，他与天主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第一节 教会影响

马建忠，字眉叔，谱名志民，学名斯才，幼名钦良，单名乾。¹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出生于江苏丹阳（今镇江）的一个商人家庭，家族信奉天主教。在少年时代，马建忠进入天主教会创办的徐汇公学学习。这种特殊的宗教背景和教会学校教育，表明教会在他早年生活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位于南北交通枢纽的镇江，是中国天主教最早传入地区，早在元代就有关于天主教徒的记载。大约在明朝末年，马家皈依了天主教。马建忠的家乡——江苏丹阳的马家村，到了清代逐渐发展成为聚族而居的天主教村落。尽管康熙末年就开始不断禁教，但是一些天主教家族世代保持这一信仰，马氏家族就是其中之一。在鸦片战争以后，丹阳附近大约有天主教徒七八百名。从无锡到扬子江边这一地区，有七八百名丹阳教徒聚居在四所小教堂周围；另外还有三百名左右住在城内或近郊。马建忠的父亲、母亲及祖父、祖母就是其中几个“老教友”。因为父母都是天主教徒，马建忠出生后不久，就在教堂受了洗礼成为小教徒，取教名为“玛弟”。

由于天主教家庭背景，马建忠从小生活在宗教气氛十分浓厚的环境里，童年时代便耳濡目染，受着《圣经》教义的熏陶。母亲沈氏是一个贤惠正直、深明事理的人，而且她还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教徒，对马建忠兄弟的教导非常严格，尤其注意对孩子对教义、教规上的教育。以后，虽然马建忠退出了教会，但是他严于律己的生活作风却保持了一生。可见，幼年时期的家庭教育对于马建忠后来一些行为的影响。

马建忠的少年时代是在徐汇公学度过的，它对马建忠的知识结构和思想

¹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2016页。

观念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天主教耶稣会素来以办学著称，它所办的中等学校一般称为“公学”。徐汇公学就是耶稣会在上海创办的一所著名的教会学校，也是天主教会创办较早的一所学校。1849年五、六月间，江南地区发生了罕见的特大水灾，许多难民流离失所，尤其是儿童。上海徐家汇耶稣会的司铎设法收容这些孩子，并且加以教育，这就是徐汇公学的胚胎。1850年时达到二十一人，而且其中不乏优秀子弟，于是把临时收容改为有组织性的教导，正式成立学校，取名叫徐汇公学。由于这是耶稣会所办的学校，所以奉耶稣会依纳爵为主保，故又称为依纳爵公学。这就是徐汇公学的由来。²

1851年，马建忠的哥哥马相伯只身来到上海，进入了这所刚刚由法国耶稣会创办的徐汇公学学习。就在马相伯进入徐汇公学学习的第三年，因清军与太平军在其家乡镇江交战，马家不得不辗转搬迁。过了不久，马相伯一家终于全部迁到了上海。全家迁到上海后，弟弟马建忠也进入徐汇公学，这一年马建忠年仅八岁。马相伯在徐汇公学的学名为马斯臧，马建忠学名为马斯才。此时徐汇公学的校长为意大利人晁德莅(Angelo Zottoli)。他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和汉学家，1848年来华，终身寓居徐家汇，后来还曾担任耶稣会初学院的院长、神学院神师等职务。³ 马建忠就是在徐汇公学打下了良好的知识基础，校长晁德莅(Angelo Zottoli)“精汉学，并擅自然科学，先生(马建忠)从其游，潜心于希腊、拉丁、法兰西文字及数理等学。”⁴

徐汇公学初创时的课程设立还比较简单，它以后的课程及教学改革是与意大利籍校长晁德莅(Angelo Zottoli)分不开的。晁德莅(Angelo Zottoli)对该校的一系列改革与创新，使徐汇公学发生了一系列有目共睹的变化，尤其是学校规模在短短几年内不断得到了扩充。徐汇公学课程与教学的一大特点是，以教理为主，同时兼习中国传统儒学课程。但这期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一直较为鼓励公学的学生在接受天主教教义的同时，通过科举，或成为官学生，或跻身仕途。因此，在徐汇公学学习的学生均有责任在校为各级科举考试做准备。和哥哥在徐汇公学做着科举梦一样，马建忠早期在该校的学习，目标之一也是梦想一朝金榜题名，但很不幸的是，马建忠自1860年“执笔

² 《徐汇公学校史》，李楚材编著：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01页。

³ 《晁德莅》，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60页。

⁴ 《马建忠》，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99页。

学举子业”以后，⁵在科举之途上毫无建树。与哥哥不同的是，马建忠很快从科举之梦破灭中猛然警醒。他感到应该从泰西之学中吸取有用的东西，从而为民族的振兴和国家的富强开出可以救治的药方，而不再沉湎于过时腐朽的八股文之中。从此，马建忠即弃其前所学，深入研究当时之经世致用的学问，以后则一跃而成为近代早期著名的启蒙思想家。

徐汇公学的学习生活，使马建忠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尤其是儒家孔孟文化的认识获得了一种独特的视角，这种视角就是一种批判眼光。马建忠在徐汇公学打下的扎实的国学及国文根底为他以后游刃有余地从事学术研究及洋务运动奠定了重要基础，甚至也为他在日后外交场合派上了用场。和当时封建官学和洋务学堂不同，在徐汇公学，中、西两种主流文化可以自由传播。这种特殊的思想环境和教育渊源使徐汇公学的学生置身于两种可以互相交会碰撞的思想语境之中。在两种互相参照的文化体系里，无论是之于儒学，还是之于西学，徐汇公学学生都可能获得较为准确的判断能力。显然，徐汇公学的教育为他思想的成长、世界观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条件。

马建忠和哥哥马相伯在徐汇公学的学习生活是一帆风顺的，原本他们都很有可能走上从事教会事业的道路，但是在1870年，发生在马建忠兄弟身上的一件小事，对马建忠离开教会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同时也刺激了马相伯。当时，马相伯、马建忠兄弟住在徐汇公学一座朝南的房间。他们已经住在这里好几年了。这一年，从巴黎省来了一位法籍修士，修院按塔扬(Tailhan)神父将这位法籍修士安排到马氏兄弟的房间去。在平常，对修士宿舍进行调整，算不上一件了不得的事情。但现在，为了安排一位外籍修士，中国修士就要让出原来的住处，也就是说，在按塔扬(Tailhan)神父看来，中外修士地位是有高低之分的。血气方刚的马建忠，身为四品修士，当然受不了这种侮辱，一气之下，愤而离会。其时，马相伯已完成了耶稣会最高学问的研修，正准备神学博士学位的考试。马相伯强忍着留了下来。但这件事情，给了他很大的刺激。⁶

这件事情说明，当时在耶稣会内部也存在着修士待遇不平的现象，对外籍修士的优待和对中国修士的歧视是普遍存在的。而马建忠兄弟具有很强的

⁵ 《日记》，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3页。

⁶ 薛玉琴，刘正伟：百年家族——马相伯，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4页。

自尊心和爱国思想，所以他们对教会的这种行为十分反感，尽管出身于老教徒世家，但是他们都先后退出了教会，以示抗议。而教会方面对他们的行为却有另外一种说法。据《江南传教史》记载：“1872年，在华天主教会在徐家汇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决定在江南教区成立江南科学委员会，以实施科学与文化研究方案，扩大天主教在华的影响。高龙磐(Colobel, Auguste)神父还负责专门培养有关科学观察方面的人才。两位耶稣会读书修士，马氏两兄弟，马若瑟和马玛弟预备将来负责管理这个部门；可惜他俩没有恒心，终于还俗出了修会，后又进入政界，并担任了重要的职务。”⁷文中提到的马氏两兄弟就是马相伯和马建忠。这段文字没有对马氏兄弟二人还俗退出修会原因作出交代，实际上，马氏兄弟二人并非对科学工作毫无兴趣。在徐汇公学及修道院期间，马相伯曾怀着极大的兴趣投入到科学的学习和研究中。

教会方面推卸责任，把马氏兄弟退会归为两人的原因，实际上却在实际活动中对马相伯、马建忠等中国籍修士和神父百般排挤。教会安排马建忠兄弟参与科学研究，只是一种借口而已。在这一借口之下，是对中国籍神职人员的排挤和搁置。从客观上说，马建忠和马相伯先后退出教会的原因是出于不愿意继续为压迫中国人的外国宗教势力服务，他们要为了中国的崛起而贡献自己的力量。马相伯后来虽然又回到教会，但是他一直在为争取中国天主教的独立自主，不受外国势力的控制而努力，并为之奋斗终身。

第二节 留法生活

1874年，马建忠正式离开了耶稣会，投身李鸿章幕府。1877年初，由李鸿章领衔，沈葆楨及继任船政大臣丁日昌、吴赞诚等反复讨论议定的《选派船政生徒出洋肄业章程》上奏清廷，很快获准。在奏折中，李鸿章特地保举马建忠以郎中身份随船政学堂学生前往欧洲留学深造，“随员马建忠并制造学生十四名，艺徒四名，共十九名”。⁸据《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记载，“三年（1877年），首届福州船厂学生出洋，先生（指马建忠）由李鸿章选

⁷（法）史世徽著，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江南传教史（第二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07页。

⁸《闽厂学生出洋学习折》，唐小轩主编：《李鸿章全集（2）》，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8页。

派，以随员兼法文翻译同行。”⁹不久，晚清帝国海军学堂的第一批留学生远赴欧洲留学，马建忠自然是其中一员。

马建忠于1877年抵达巴黎之后，首先是与同行留学的陈季同一起聘请法国教师学习各国律例以及交涉公法，大体上可以看做是正式进入法国学校之前的一种预备性教育。随后，马建忠进入巴黎的私立政治学院开始学习。该“私立政治学院”创立于1872年，是一所专门培养外交官与行政官吏的两年制私立学校，直到1931年仍是允许没有参加法国中学毕业会考的学生直接入学，因此应是适合于如马建忠等外国留学生。马建忠在这所政治学院留学的时间为两学年，其中第一学年为1877年11月19日至1878年6月8日，第二学年为1878年11月19日至1879年6月8日。马建忠在上述私立政治学院学习的同时，又正式通过法国中学毕业会考而进入巴黎法科大学学习，至1879年正式毕业，全部学习时间仍是两年。简言之，马建忠在留学法国期间利用两年时间，分别就读于巴黎的私立政治学院及巴黎法科大学，并在该两所学校正式毕业。当时马建忠还在法国兼任清政府驻法使馆翻译，因此尽管他直到1880年才回国，亦即在法国先后居住了三年（1877—1880）时间，而实际在法国的上述两个学校所学习的期间却只有两年。¹⁰

马建忠在巴黎私立政治学院分别选修了外交学领域与行政学领域的课程。1878年6月，马建忠参加了外交学领域和行政学领域各四门科目的考试，到1879年11月又参加了外交学领域四门科目的考试。郭嵩焘在日记中曾经记载了马建忠在巴黎私立政治学院的学习情况：“马眉叔在巴黎政治学堂专习公法。其学堂肄业大纲，凡分五等：一，出使各国；二，国家机密政事；三，地方管理民事；四，户部征收赋税之事；五，总核出入款项。每岁户部、外部拔取其优，以备录用。而在馆肆习者以两年为期，或专习，或全习，期于有成。”¹¹根据巴黎私立政治学院的1878至1879年度要览记载，马建忠在该政治学院获得了“特别毕业证书”，亦即正式毕业于该学院，至于这个毕业证书并不属于什么学位证明。此外，马建忠正式参加法国中学毕业会考并成绩合格，从而取得了进入法国大学学习的资格，亦即马建忠在《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中所谓“文词秀才”、“格致秀才”之试，大体可以翻译为“文

⁹ 《马建忠》，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00页。

¹⁰ 权赫秀：马建忠留法史实辨误二则，《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01期。

¹¹ 钟叔河主编，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704至705页。

学与理学中学毕业会考合格者”。而后，马建忠进入巴黎法科大学学习，并于1879年正式提出学位论文，经审查通过，获得了该大学的法学学士学位，此即马建忠在《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中所谓“律例举人”。¹²

作为法国一所著名的高等学府，巴黎政治学院教学方法十分灵活，既重讲论，亦有问难。对于像马建忠这样的外国学生，学校还特别指派精通英、普两国语言的老师作专门指导。每年由教师亲加考验，第一年专主问答，第二年专主考试论说，得优等先给以凭照。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记载了巴黎政治学院每日讲论两次的内容：

“一，臣专为通声气、采虚实，知彼知我。并举了两个例子，俄土之战与普法战争来说明知彼知己的重要。外交使臣应能在宴会应酬之间，无意中探国人之口气，察国中之政治。二，比利时初立国，法人议合二国之关并而为一，一纳进口税，可以通行两国之地，不再征收，按月分派。三，日本重修和约，增改二事：一详定税则；一禁止外国商船在日本口岸贩运。而中国竟以通商口岸视同外地。四，论英、法税则，历来本重，甚且有值百抽百之数，禁货亦多。近年英国立约，减定税则，商货大畅。英、法制造之厂，因之日兴。根据具体情况，进口货税有轻有重。五，意、法之文出自拉丁；英则半由拉丁；奥、普则尽由撒克桑。”¹³

以上讲论内容，无疑是马建忠早期维新改良思想形成的重要源头，尤其是对他的经济、外交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事实正是这样，马建忠的改良思想以文字留存下来的，大多是在法国留学期间写就的，诸如《上李伯相言出洋功课书》、《巴黎复友人书》、《玛赛复友人书》、《铁道论》、《借债以开铁道说》等。在这些文章中，他提出了因时递变、敦睦外交、设立出使学堂、培养使才的外交思想；同时又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国内在裁撤厘金，增加洋货进口税，借用外资修筑铁路，促进民族工商业发展等经济思想。

马建忠在法留学期间，对所习知识无不刻苦钻研，从而取得了优异地成绩。1878年5月下旬，巴黎政治学院举行政治学位考试。马建忠参加了这次考试，并以优异成绩顺利通过。马建忠在有关书信中，《上李伯相言出洋功课书》记录下了这次考试内容，其中共有对策八条：

¹² 《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7页。

¹³ 钟叔河主编，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705至707页。

第一问：“万国公法都凡一千八百页，历来各国交涉兴兵疑案存焉。”第二问：“各类条约，论各国通商、译信、电报、铁路、权量、钱币、佃渔、监犯及领事交涉各事。”第三问：“各国商例，论商会汇票所以持信，于以知近今百年西人之富不专在机器之创兴，而其要领专在保护商会，善法美政，昭然可举。是以铁路、电线、汽机、矿务成本之巨，要之以信，不患其众擎不举也；金银有限而用款无穷，以楮代币，约之以信，而一钱可得数百钱之用也。”第四问：“各国外史专论公使外部密扎要函，而后知普之称雄，俄之一统，与夫俄、土之宿怨，英、法之代兴，其故可覩缕而陈也。”第五问：“英、美、法三国政术治化之异同，上下相维之道，利弊何如？英能持久而不变，美则不变而多弊，法则屡变而屡坏，其故何在？”第六问：“普、比、瑞、奥四国政术治化，普之鲸吞各邦，瑞之联络各部，比为局外之国，奥为新蹶之国，措置庶务，孰为得失？”第七问：“各国吏治异同，或为君主，或为民主，或为君民共主之国，其定法、执法、审法之权分而任之，不责于一身，权不相侵，故其政事，纲举目张，桀然可观。催科不由长官，墨吏无所逞其欲；罪名定于乡老，酷吏无所舞文。人人有自立之权，即人人有自爱之意。”第八问：“赋税之科则，国债之多少，西国赋税十倍于中华而民无怨者，国债贷之于民而民不疑，其故安在？”¹⁴

八条对策涉及政治、经济、外交等诸多内容，又包括俄、美以及西欧等主要国家，马建忠均能对答如流，并且博得了主考老师的好评。这次考试为期三天，“其书策不下二十本，策问之条目盖百许计。忠逐一详对，俱得学师优奖。”对此，巴黎政治学院院报还发表专文报道此事，称赞马建忠：“能洞隐烛微，提纲挈领，非徒钻故纸者可比。”¹⁵留学仅一年的马建忠就取得了如此骄人的成绩，大长了中国人的气势，使一向鄙视中国的法国人刮目相看，从此不敢再小瞧。

马建忠除了在巴黎政治学院学习之外，还先后担任了驻法公使郭嵩焘和曾纪泽的法文翻译，并参与了一些重要外交活动。马建忠在法国留学期间，苦心问学，不但学业上获得了极大长进，而且，外交实践能力也得到了极大

¹⁴ 《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5至156页。

¹⁵ 《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6页。

历练。实际上，作为使馆的翻译，一些重要的外交活动是少不了马建忠的。1878年5月6日，郭嵩焘受命兼任驻法大使，向法国总统麦克马洪（MacMahon）呈递国书时，随从就有马建忠、德明等。郭嵩焘日记记载：

“因携翻译德明、联芳、马建忠、陈季同恭奉国书至宫廷内院下车。院内列队奏乐，宫官数员相迎劳。上楼转过二厅房，以为当可小憩，莫拉前行，更转一厅入。则其伯里玺天德(President，即总统)免冠立，左右侍从十余人。因前进鞠躬。德明递交国书。宣读颂词，马建忠复以法文译诵。其伯里玺天德复宣读答辞。马建忠译言伯里玺天德云：‘初闻中国简派大臣驻扎法国，甚为心感。迨后闻所派为贵钦差，早闻其名，尤为喜悦。得钦差居此，必能使两国合谊日深，交相维系。遇有应办事件，无不竭力相助。’¹⁶”

这次外交活动只是马建忠参与的众多外交事件之一，从其中可以看出，马建忠的法文已经相当熟练，而且熟知各种外交礼仪。郭嵩焘对马建忠的才华也非常赏识，经常让他参与各种外交活动。为使马建忠增广见识，培养其外交实践能力，郭嵩焘有时还让他代理及出席一些重要的会议。此外，郭嵩焘还对马建忠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给予百般照顾。他经常找马建忠，询其在学堂的学习情况，有时还在自己的日记中作记录。1879年正月，郭嵩焘接到清廷命令，其驻英、法公使的职务撤销，由曾纪泽接替。曾纪泽至法国后，继续聘请马建忠充当大使馆的翻译官。在留学法国期间，马建忠通过与英、法等国外交界人士的接触，办事能力、思想认识水平都有很大长进。他把书本知识灵活运用到实践中，结合自己的亲身感受，写下了上述诸多反映改良主义思想的政论性文章。

马建忠在努力完成学业的同时，还深入法国社会，以加深对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深切理解。他在巴黎不放过一切机会，参观各种展览，考察工厂、郊区、采购图书，此外，他还到印刷厂、电报局、纺织厂、轮船、军营、法国人家庭等地方参观访问。尤其是1878年5月1日至11日在巴黎举行的万国博览会，给马建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写给李鸿章的《上李伯相言出洋功课书》中，还一语道破法国举办这次博览会的目的：“然此不过夸陈设之精，供游观之乐，以奢靡相矜而已，岂开会之本意哉！盖法人之设此会，意不在炫奇而在铺张。盖法战败赔款后几难复振，近则极力讲富强，特设此

¹⁶ 钟叔河主编，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563页。

会以夸富于外人。”¹⁷马建忠对法国博览会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1870年普法两国交战，此役法国损失近二百亿法郎（包括赔款），以及富有铁矿之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使得法国元气大伤，几难复振。战后的第八年，法国举办此次万国博览会，其目的是显示法国经过这场战争又重新振作起来的雄厚实力，力图恢复与保持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

在法国的留学经历，是影响马建忠一生的重要阶段。马建忠在国内时，以为只要借鉴西方的先进技术，就可以实现国家富强的目的。到了法国后，亲身感受到封建中国和近代化西方的巨大差距，并积极寻找原因。在巴黎政治学院的学习，使他的理论水平有很大提高，在思想上逐渐脱离了洋务派的范畴，成为早期改良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另外，前文也已经指出，他的外交实践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的锻炼，为以后从事许多重要的外交活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¹⁷ 《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8页。

第二章 马建忠的外交仕途

在教会学校的学习，培养了马建忠良好的知识基础，同时也影响了他的世界观。而留学法国的经历，又使他的眼界更加开阔。在中国近代史上，马建忠可以说是清政府较早派出学习的官员（出洋时已获郎中官衔）。他具有丰富系统的西学知识，尤其是外交方面，这是清朝官员中鲜有的。回国以后，他运用自己的外交知识和技巧，为清政府处理了一些复杂的外交事务。

第一节 赴南洋处理鸦片问题

鸦片泛滥走私，禁而不绝，一直是晚清统治者面临的棘手问题，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对鸦片贸易一直无法强硬。鉴于鸦片走私泛滥及其危害，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禁烟呼声又起。1874年，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有增加洋药税厘、杜绝入口之议。如无配套措施，鸦片税厘增加结果，可能导致偷漏走私更烈。1881年港籍华商何献墀有设洋药公司、包揽中国鸦片贸易之议。李鸿章得悉这一计划后，极为赞赏，认为这是个既能实现加税，又能杜绝偷漏的两全之策。为绝走私偷漏，李鸿章也有意将鸦片包购专卖，由清官方指定公司，直接到产地印度，将鸦片包购，然后实行专卖，消除商人偷漏走私的中间环节。而要实现鸦片增税专卖，须得英、印政府许可。¹⁸1881年马建忠奉命前往香港、南洋、印度等地，除了疏通《烟台条约》的鸦片税厘并征事宜外，一个重要的使命，即为访求鸦片增税专卖情形。

按照预定计划，到达香港后，马建忠即去拜访香港总督燕泉斯。马建忠首先递交了李鸿章的信函，接着和他详谈许久。此次谈话马建忠提出拟在香港设立一个由政府允许的商人公司承揽鸦片贸易，希望得到总督的协助，并说明此举的目的在于“务期烟税可加而漏私尽绝，且使主持鸦片权归公家而不归私贩，庶期年减一年，渐有消除之望。”¹⁹港督表示可以协助，但他反对交商人公司承揽鸦片贸易，并由中国政府在港设员征税。他主张由国家自行承办，未售各口之先，可以在港寄储。但是无论是由商人承揽还是国家承

¹⁸ 《致曾劼刚星使》，王学主编：《李鸿章全集（7）》，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819页。

¹⁹ 《南行记》，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抄（再补编）》，杭州：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办，都必须与英印当局达成协议，需要印度同意只售给中国政府指定的商人公司或国家贸易机构而不售他人。马建忠请燕泉斯修书印度总督转为介绍，他要去印度详细稳妥的商讨这个问题。

马建忠到达印度加尔各答后，拜会省督亚散依登并晤见主管鸦片事务的福贝斯。福贝斯带他参观了鸦片拍卖现场，并给了他有关鸦片章程书三卷。随后马建忠又前往西姆拉，递交公文和港督燕泉斯信函后，拜会总督雷滂，并说明来意。总督委派负责内务成员贝冷与其进行具体商谈。马建忠指出：“鸦片为害，世所共知。贵国都设立鸦片禁会，会中人在议院者力言贩卖鸦片之非。惟鸦片嗜食者众，流毒已深，非一旦所可禁绝，潜移默化，须宽以二三十年之久，即于其中暗寓一禁止良法焉。因思印度政府虽以鸦片为大宗，然善理财者究未可恃为度支正项，况议院腾谤已多，窃揣此项终须截止。惟鸦片岁入八、九百万金镑，为数即巨，惟积二、三十年徐图别项以弥缝之，则亦遽难截止。是中国禁绝鸦片与贵国截止鸦片宜缓不宜速，事虽异，理正同也。”接着，他提出了具体方案：由双方议定，印度运往中国的鸦片专售于中国国家或由政府指定承揽的公司，通盘交易，不复辗转他商之手，将鸦片出口箱数立一定额，每岁递减，约积至二三十年之久，减完自然禁绝。²⁰

贝冷原则上表示同意马建忠的办法，还说他认为国家自行承办比指定商人承办会更好些，但接着又提出一系列问题：一是印度所产的三种鸦片之一白皮烟产于土邦，如果由国家统一购买，办理很不容易，需要从长计议；二是鸦片若由两国专卖，贸易额如何议定，是从高数还是从低数，或者是取数年平均数，亦需详筹；三是鸦片收入关系财政度支，如果一年一减，时间太仓促，一时难以寻找别项收入弥补，不如五年一减；四是鸦片岁入 900 万金镑，数额巨大，而且厂局资本很大，员役尤其多，二三十年全部停止的期限未免太紧迫，不如延长至五十年比较从容。²¹马建忠针对贝冷提出的这些问题指出，白皮烟应该同公烟、姑烟一例专售，印度政府定能解决；至于鸦片贸易额宜从低数，此项收入究与印度度支正额无关宏旨；印度近年来茶叶、棉花出口增加，前者收入足可弥补后者，因此鸦片贸易每年递减可行，无需

²⁰ 《马道建忠在印度西末喇谒晤梨督贝户部问答节略》，李长仁主编：李鸿章全集（8），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561页。

²¹ 《马道建忠在印度西末喇谒晤梨督贝户部问答节略》，李长仁主编：李鸿章全集（8），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562页。

等候五年再减；但是他对贝冷所提出的禁绝期限宽延至五十年没有提出反驳。但是，终究因为分歧太多，双方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印度总督雷滂给李鸿章写了复函交给马建忠带回。

马建忠此次南行到此告一段落，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成果，他的使命以失败告终。表面上看，似乎英印统治者没有在原则上拒绝，但他们提出一大堆搪塞之词、反建议以及主张他日遣使再议，实际上是把此事一推了之。马建忠的使命虽然失败，但是他此次的印度之行的意义却十分重要。他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派赴印度的官方使者，是最早游历过印度并作了记载的人。他和同行的名士吴广霁所著的《南行记》和《南行日记》是十九世纪中国人记述的关于印度见闻的绝无仅有的珍贵史料。

由印度归国后，马建忠协助李鸿章就鸦片税厘问题，与英国公使威妥玛多次谈判，并代表李鸿章就包销印度鸦片办法，与英国汇丰银行和英商沙苗反复商议。由于港、英、德多方商人力图揽办，鸦片包销争夺激烈，不了了之。最后，总理衙门只肯接受税厘并征办法。1885年，清驻英公使曾纪泽与英外部签订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规定进口鸦片每箱（百斤）纳税厘110两。²²这应是在马建忠经办的基础上议定的。

马建忠关于“鸦片专卖”、“寓禁于征”²³的交涉，是在清政府对鸦片问题无良法情况下的迫不得已之举。在此前后，鸦片税厘已成为清政府的主要税源之一，军饷、外债本息、轮船经费、赔款等项开支，均由此拨付。故而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晚清官员对于禁烟虽有种种建议，但最终只得个增税的结局。鸦片税厘并征在当时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它对中国的危害，毕竟比任凭走私和贪吏中饱私囊要小一些。

第二节 赴朝鲜处理商约和“壬午兵变”

马建忠从南洋回来，第二年，又奉命踏上了朝鲜半岛。自1637年以来，朝鲜除了和中国有藩属关系以及偶尔和日本交换使臣之外，和其余国家一直没有交往，因此，西洋人称它为“隐士的王国”。可惜，这个“隐士的王国”

²² 《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71页。

²³ 赵尔巽等：清史稿（第41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482页。

到了19世纪70年代后，随着世界资本主向帝国主义过渡，再也无法维持单一的和清政府的藩属关系。而且，由于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便成为列强争夺中国的跳板之一。

1876年，日本逼迫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这个条约，开头就声明“朝鲜国乃自主之邦”，日本借此否定了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²⁴其时，法国正步步入侵越南，中俄间伊犁问题尚未解决，日本的侵略野心，自然引起朝野间更大的恐慌。总理衙门主张劝导朝鲜与英、美等国立约通商，利用国际矛盾，借以牵制日本，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1882年，马建忠三次出使朝鲜，即是为执行清政府的这种“牵制——干涉”政策。

朝鲜向李鸿章表示决意与各国通商牵制日俄，李鸿章命马建忠等代拟朝鲜与各国通商章程。朝鲜要求李鸿章代为主持，李鸿章率马建忠与美国谈判，辩论20余日始有成议。各方均要求中国派人同赴朝鲜签约，李鸿章认为马建忠精明干练，于交涉公法研究素深，并且始终参加有关谈判，即奏准派马建忠前往。²⁵

三月初九日，因李鸿章母病死守制，由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三月二十一日，马建忠与提督丁汝昌到达朝鲜。三月二十六日，马建忠与薛斐尔会谈美韩条约。决定另由朝鲜国王照会，声明为中国属邦。三月二十八日，朝鲜国王照会美国总统，声明朝鲜为中国属邦。四月初六日，美韩条约在仁川签订，马建忠与丁汝昌监临。²⁶四月十四日，朝鲜照会英国，声明为中国属邦。四月二十一日，英韩条约在仁川签订，马建忠与丁汝昌监临。²⁷五月初十日，朝鲜照会德国，声明为中国属邦。五月十五日，德韩条约在仁川签订，马建忠与丁汝昌监临。²⁸马建忠向李鸿章呈递《论朝鲜商约界务禀》。当时，日本政府正极力煽动朝鲜政府亲日排华，马建忠深恐朝鲜政府不再继续承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外国政府不接受朝鲜承认为中国属邦的照会。结果，朝鲜政府仍然承认为中国属邦，甚至，有关照会的文稿也是请马建忠代拟的，美、英、德等国也都顺利地接受了朝鲜政府的有关照会，使马建忠深感满意。

但是，就在马建忠回国后不久，朝鲜国内烽烟再起。光绪八年（1882

²⁴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16页。

²⁵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92页。

²⁶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93页。

²⁷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94页。

²⁸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95页。

年)六月初九,朝鲜汉城发生士兵和下层民众反对日本侵略和封建压迫的起义。原来因朝鲜国王无嗣,王后决定将大院君李应之子李熙召进宫入承大统,并由中国皇帝册封为朝鲜国主。李熙亲政后,大权逐渐落入闵妃手里。闵妃集团聘用日本军官崛本礼造为教练,训练新军,改革内政。各营兵士抗命起义,城市贫民也纷纷响应,数千人攻打王宫,袭击日本使馆,七名日本军官被杀,日使花房义质等冒雨逃窜。起义被阴谋夺权的国王生父李应利用,从而演变成了一场骚乱,史称“壬午兵变”。

日本国内闻朝鲜兵变,舆论大哗。日本政府决定抓住这次机会,扩大在朝的利益。于是,派遣饶于谋略的外务相井上馨督率海军,偕同花房义质开赴朝鲜。清廷出使日本大臣黎庶昌获悉这一消息后,火速将日本出兵动向密电北洋大臣张树声。张树声深知朝鲜局势的恶化直接关系到中国边境的安危,所以当他接到黎庶昌的告急密电后,一面发函商诸总署,是否派马建忠前往;一面先行将正要向李鸿章汇报情况的马建忠截留,命其待命行事。²⁹

六月二十二日,马建忠奉电谕:不用回津,径直至烟台会同丁汝昌率超勇、扬威、威远三艘兵轮东渡。³⁰二十七日晚,马建忠一行驶抵汉口月尾岛下。此时,日本兵船一艘已先于口内停泊。马建忠立即星夜派人详探此次兵变始末。在获悉大院君确有煽动情迹,日本想趁此侵朝的确实情报后,马建忠即与丁汝昌商量,最后决定,由丁汝昌回津禀报张树声,面陈机宜,并把马建忠的建议转达给张树声;马建忠则留守朝鲜,设法拖住日本使官。七月初七,威远、日新等五艘轮船载着吴长庆督率的二千淮勇自西而东驶来,这无疑为马建忠等人增加了不可缺少的后备力量。³¹

其时,花房义质已对朝鲜大员多次提出惩办赔偿交涉,百端要挟。为了尽快安定朝鲜政局,马建忠在稳住花房义质后,立即与吴长庆、丁汝昌密定机宜,决定照原计划行事:一面部署逮捕大院君李罡应的方案,一面镇压“乱党”。李罡应被软禁后,吴长庆则督率淮军,配合朝鲜王京在京城内外扫除李罡应党羽,使朝鲜的局势很快得以平定。

马建忠无法直接插手日朝签约之事,便暗中与朝鲜方面研究各项条款要点,提供参考意见,以抑制日方的种种无理要求。可惜,当急于求得国内安

²⁹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96页。

³⁰ 《东行续录》,中国历史研究社编:《东行三录》,上海: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55页。

³¹ 《东行续录》,中国历史研究社编:《东行三录》,上海: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68至69页。

定的朝鲜代表面对狡猾多端的日方代表时，马建忠的幕后指点均付之东流。

《仁川条约》的签订，在清政府内部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马建忠因此背上了卖国的“黑锅”。十月十二日，李鸿章上《查复马建忠参案折》，对马建忠被参各条逐一加以解释，特别指出：“本年美、英、德各国与朝鲜议约，实赖其前往赞助，声明中国属邦字样，俾大义复昭于天壤。此次擒执李罡应，并筹办善后事宜，机敏异常，才能应变，即西人亦敬重之。夫洋务人才难得，论人者不免苛求，用人者当知护惜，臣等何敢空言诬罔，致令任事者裹足寒心哉。”³²

第三节 招商局与旗昌“售产换旗”

马建忠在中法战争前后的涉外活动，主要是襄助李鸿章力维和局，保护招商局船产免遭损失。李鸿章极力以外交手段，解决中法越南争端，马建忠则协助他奔波于天津、上海之间，通过熟识的法国官员，探询法方动向和意图，并极力争取他国调停。中法交涉期间，清政府对法方情况比较了解，国外有曾纪泽、陈季同提供情报，在国内，马建忠起了一定作用。

188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上海，造成银根奇紧，出现金融倒帐风潮。李鸿章一手经办的洋务企业——上海轮船招商局当然也会深受其影响。当时，唐廷枢、徐润分别任上海轮船招商局的总办、会办。唐、徐二人因挪用招商局的公款，一时无法填补，造成招商局负债累累，经营陷入困境。为重新整顿轮船招商局，1884年，李鸿章任命马建忠为招商局会办，其兄马相伯则被委派去襄助调查上海轮船招商局各地分局帐目。³³

1884年夏，中法海战爆发在即，法人遍布谣言，遇船劫夺。时任招商局会办的马建忠认为，“与其悬华旗被攫有伤国威，莫若暂用他旗来往无阻。”³⁴曾一度与英国怡和洋行洽谈，以150万两白银作价，将招商局船产售与怡和。轮船股商也意识到，若将全班停驶，招商局向外所借的债款会被闻风追讨，别人欠招商局的款项也会延缓不归，而招商局每月的养船费万余将没有

³² 《查复马建忠参案折》，宁波，杨嘉敏主编：《李鸿章全集(3)》，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7页。

³³ 张若谷：《马相伯先生年谱》，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150页。

³⁴ 《马道来电》，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电稿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9页。

着落，也倾向按外国通例暂售他国，让各轮悬中立国旗航行。因英国手续繁杂，美国的简便，一签合同即可生效，马建忠接受英国律师担文的建议，将招商局轮船作价 525 万两白银，暂售给美在华的旗昌洋行。规定公司换旗期限不定，以便权自我操，并在领事处押卖契银票为证。此事经马建忠向李鸿章请示后执行。李鸿章知此事“纠葛甚多”，事先电嘱马建忠“唐道系始终经理局务，简约内必申明”，详细合同亦须待唐回沪后，“会商定义，稟请立案，方作准”，³⁵将当时在招商局已经失势的唐廷枢拉上，以使此事更合程序，但在战事结束之后能否收回招商局，马建忠必须独自承担所有责任。马建忠“固知此举必遭物议，但责在保全局本，遑恤人言！”³⁶

招商局轮船出售事上报后，朝议大起。“京师清流诸公，哗然忿骇，以为马建忠得外洋数十万金钱，擅将招商全局卖与外人，而数百万之国帑商本，皆付流水。”有请将之“尸诸市朝”者。翁同龢尚书电飭其到京面诘。³⁷李鸿章上书陈述经过，言招商局乃仿西国公司董商经管制，其“与外人交涉权变之处，官法所不能绳者，尚可援西例维持”。他在说明暂售局产乃“万国通行之公例”的同时，言此事起因乃“沪上绅商，私相筹议”而定，唐廷枢与马建忠先后经手，而由马建忠“毅然决然独担其责”，与众商“定义”而成。既解释事情原委。又将自我开脱。³⁸

慈禧令马建忠将收回一事“妥为办理”，否则治以重罪。1885 年《中法新约》签订后，盛宣怀、马建忠与旗昌洋行行东斯美德（士米德）反复交涉。由于美方坚持由原先经手售出的官员办理，而马建忠此时因公务繁忙无法抽身，最后由马相伯与盛宣怀一起，将轮船原价收回。

³⁵ 《寄沪招商局马道》，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电稿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 188 页。

³⁶ 《马道来电》，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电稿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 189 页。

³⁷ 王伯恭：. 蝥庐随笔，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年版，第 29 至 30 页。

³⁸ 《复陈商局轮船暂售美国折》，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 1198 至 1199 页。

第三章 马建忠的改良主义思想

马建忠的改良主义思想，主要表现在他晚年的文集《适可斋记言记行》中。《适可斋记行》收集的是他南洋之行和朝鲜之行的日记。《适可斋记言》的主要内容是他的一些书信和奏章，年代由一八七七到一八九四年。这十七年内，洋务运动正经历着由走下坡路到破产的整个过程。而马建忠作为这次运动的参与者，思想上却逐渐脱离了洋务派的范畴。因此在《适可斋记言》所收集的他不同时期的文章中，马建忠集中表现了各种改良主义思想，主要包括经济思想、外交思想、海防思想。

第一节 经济思想

一、税收思想

在关税问题上，马建忠主张“重征进口货而轻征出口货”。³⁹他试图根据这种西方通行的征税原则来修改晚清社会不合理的海关低税率，在十年之内把中国的税则改的与欧洲各种大体相同。

19世纪，资本主义国家保护本国工业的主要经济手段是关税。关税调控经济的职能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它具有保护国家经济、增加财政收入的双重职能。保护性关税要求进口税率必须高于出口税率，为此，必须设法通过“奖出限入”来鼓励和限制国内外商品的进出口。深受西方经济学熏染的马建忠很清楚中国当时的关税税率极不合理。他指出，西方国家对出口土货基本上是不征税或减少征税，而对于进口货征税，“轻则至值百抽五抽十，重则至值百抽五六十，且有值抽百之多。”而中国征税恰与西方相反，进口税率一般均为值百抽五，可是主要出口商品如茶叶出口税竟高达10%左右，“各种货物，除鸦片外无所轩轻，正子两税不过值百抽七有半之数。”⁴⁰可见，中国的进出口关税率不仅与西方贸易保护原则背道而驰，甚至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反作用。因此马建忠强调一定要依照西方贸易保护常规，改革中国的现行海

³⁹ 《富民说》，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

⁴⁰ 《复李伯相札议中外官交涉仪式、洋货入内地免厘禀》，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0页。

关税率,对中国出口货物实行轻税减厘政策:“税厘减则价贱,价贱则出口货增,出口货增则税厘更旺。”“至于进口税,马建忠则主张按照西方的方法,将货物分成四类,分别加以轻征或重征:第一种为天生物,如煤铁之类虽然中国自己也生产,但开采、运输困难,成本昂贵,进口比国产更划算,所以应该维持5%的轻税,“以广招徕”。第二种为中外都能生产的工业产品,如洋布之类,“应加重征”,甚至可以征收15%的进口税,借以保护民族产业。第三种为中国不能生产的工业产品,如钟表、玻璃器、洋酒之类,因为这是只有富室才能购买得起的高消费品,所以也应加重税率,借以抑制,税率可维持在25%左右。第四种为鸦片烟等“害人之毒物”,更应“苛征以困之”。⁴¹

上述提及,近代西方国家为鼓励本国产品大量出口,已不再征收或很少征收商品出口税。但当时的中国还不具备取消出口税的条件,因为清政府主要海关收入来自于出口税,如海军、铁路、军事工业无不依赖海关税收,所以一旦取消或削减出口税率,至少会使清政府失去一半以上的海关税收。为此,马建忠设想,在裁厘加税的交涉中先跨出第一步,即把“值百抽五”改为“值百抽十”,使得裁厘以后的关税收入与眼下的税厘总收入大体相当,而后,争取在十年以内,经过不断交涉,把中国的税则改得与欧洲各国大体相同。例如,在与外国修约谈判中下调部分出口商品税,将丝茶出口税由10%降至5%,以减轻商品负担,鼓励丝茶出口,由此失去的部分财政关税将由同时上调的部分进口税来弥补。他认为出口税下调后必然会使出口商品价格下降,出口商品数量也会同比例增长,这样既促进了出口,又可增加出口补偿财政收入,既兼顾了清政府和商民的利益,又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保护对外贸易的目的。在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刚刚出现的晚清社会,这无疑是一种实事求是且灵活实用的设想,是一项保护民族工商业的重要措施。

二、对外贸易思想

19世纪70—90年代,当国内洋务思潮热衷于“求强”、“求富”时,马建忠却从中感到了忧虑。在他看来,当时的中国非但难以富强,甚至有愈加贫困的危险。由于连年出现的外贸逆差和不断增加的洋务开支,中国财政日

⁴¹ 《富民说》,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

⁴² 《复李伯相札议中外官交涉仪式、洋货入内地免厘禀》,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1页。

益困窘，新的厘金和海关税收虽然增加了，但国家收入的增长速度仍赶不上开支的扩大。不过，马建忠知道，中国已不可能倒退回以往的年代继续闭关锁国了。几年在欧洲的生活使他看到各国的相互贸易已是世界潮流，国际间的经济往来与交流已不可避免，中国若继续消极被动地应付世界贸易的冲击，只能是“彼易我银之货岁益增，我易彼银之货岁益减”。⁴³必须变被动为主动，积极发展对外贸易，以迎接世界经济与时代的冲击与挑战。

马建忠清醒地看到，由于当时中国海军、矿山、交通等事业地建设和不断发展，即便没有出现 80 年代以来日益明显地外贸逆差，仅凭中国现有地金银货币实现“数千年来未有之创举”是完全不可能地。国内新政和近代化事业对财政开支产生了迫切要求，在欧美国家以通商致富的强烈刺激下，马建忠认为中国也“宜通商以收各国之利权”，主张积极发展对外贸易，通过对外贸易增加财富收入，只有增加财富收入，才能满足国内对财富的各种需求；只有先富，才能实现强。不仅如此，由于“富民”的信念和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影响，马建忠也认识到通过对外贸易还可以进一步满足国内人民的不同消费需求，因而强调“通商以给民生以食用”，⁴⁴主张与各国互通有无，调剂商品余额，从而改善国内人民的消费和需求结构。这种思想认识不仅与中国传统的“崇俭”、“抑奢”观念背道而驰，也与欧洲重商主义者的敛财观格格不入，反映了马建忠的思想在当时确实非同一般。

马建忠深受西方经济学影响，他认识到：虽然当时中国迫切需求金银货币，可是发展对外贸易绝不能仅仅为了追求金银货币；而且判断对外贸易利益的实现，也不能仅把贸易是否顺差作为唯一的标准。马建忠不但懂得要增加货币收入，必须避免外贸逆差，同时他也认识到，如果贸易的目的是“给民生以食用”，那么只要满足了人民的消费取得贸易逆差，仍然是实现了自己追求的贸易利益。由此可见，马建忠并非仅从贸易差额角度判断贸易利益，他坚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明确所谓贸易利益的取得，必须看其是否达到了具体的对外贸易目的。应该承认，马建忠这种辩证的分析完全正确，是他最有价值的见解之一。但是也应该看到，从增加货币收入的角度上看，马建忠

⁴³ 《富民说》，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 125 页。

⁴⁴ 《复李伯相札议中外官交涉仪式、洋货入内地免厘禀》，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 210 页。

还没有明确指出贸易顺差只是一种表面的利益，判断对外贸易实际货币收入的大小应取决于贸易中获得的利润，利润比贸易差额更能准确反映贸易收入实际利益。

由于当时国内资金求大于供，马建忠把外贸创收看的十分重要。这使他必须要更多的考虑进出口商品的价值比例关系。他坚持出口商品价值必须超过进口。当然，少进口不是不进口，马建忠主张：“欲使出口货多，则在精求中国固有之货，令其畅销也”，⁴⁵希望鼓励和改进中国传统商品丝茶等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刺激国际市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同样，通过积极发展国内制成品的生产，用国产商品逐步取代国外同类产品和实行进口替代外贸发展战略的思想不谋而合，其实质是通过逐步改变进出口商品的相互需求程度，促使对外贸易向有利于出口的方向发展。

马建忠认为，商品的质量是赢得国际信誉的重要条件，要在国际市场上经得起竞争，商品本身应该物美价廉，所以必须对出口产品“精求”，才能使之在国际市场上畅销。为了争取出口产品得优势，马建忠提出应当改进生产技术和工艺，以便在质量、价格上胜过对手，针对国内工业制成品生产能力得不足，马建忠及时看到国内原始的个体生产和分散销售经营已落后于时代，积极提倡股份公司，扩大资本数量，使生产从此胜任“大兴作”、“大贸易”。⁴⁶

从马建忠的这些见解可以看出，他清醒的认识到发展对外贸易对于当时中国的经济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他在这方面的思想也是先进而丰富的，对于处于封建社会末期的清政府来说，这些思想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三、引进外资思想

近代中国“利用外资”思想是一大进步，马建忠是这一思想的先行者，他是近代第一个系统而详尽的论述利用外资问题的思想家。他的引进外资思想可以分为如下几个主要方面：

首先，借外资以学习西方。马建忠是近代改良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他在参与洋务运动的过程中，流露出学习西方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意愿，也

⁴⁵ 《富民说》，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页。

⁴⁶ 《富民说》，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7页。

阐发了学习西方、对外开放、举借外资、振兴商务等积极的主张。马建忠认为举借外资发展经济是国外普遍的历史经验。由于他对欧美各国的历史和现状颇有研究，特别重视探讨这些国家借用外资发展国内经济的经验教训。按马建忠援引的资料估计，到1870年欧美诸国向外借债达“九万七千七百七十四兆”，而到了1880年左右，竟达到“二百万兆有奇”。⁴⁷在近代中国，大多数利用外资的论述者，都把筑造铁路作为一个主要内容。因此，马建忠引证了世界近代经济史上欧美一些国家借债筑路的实例，指出：“欧美诸国铁道迄今造成者不下四万余里，何一非借款以成”，⁴⁸比如：“法、奥、意大利诸国修治铁道之费，称贷数千兆”。不仅如此，而且，马建忠还从世界近代史上列举了不少弱国利用外资发展经济的例子，他说：“弱小如秘鲁，铁道之费借诸欧洲，并至三千二百万金磅；贫瘠如都尼斯（即突尼斯）亦借至十万金磅”。⁴⁹据此，马建忠认识到，利用外资对于强弱国家的经济事业都有益处。因而，他认为中国也应举借外资以图商务的振兴。在他看来，借用外资实属“阳为借债之名，阴收借债之效，用洋人之本，谋华民之生”⁵⁰的好事。可见，马建忠提出学习“泰西各国”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利用外资，其目的是为了发展国内经济。

其次，借外资以兴商务。马建忠把“借用外资”的主张由修建铁路扩展到其他经济领域。在出国留学前，马建忠也是位船坚炮利论者，回国后思想起了较大的变化。他曾上书李鸿章，指出西方国家富强之本不在制造精，兵纪严，而在于护商会，扶助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因此，他一再主张振兴商务，发展国内经济。可是，他看到清政府财殚力竭，而民间也千疮百孔，无力投资发展经济。所以，他提出“借债以治道途，以辟山泽，以浚海口，以兴铁道，凡所以为民谋生之具，即所以为国开财之源”。⁵¹在他看来，借用外资

⁴⁷ 《借债以开铁道说》，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5页。

⁴⁸ 《借债以开铁道说》，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至151页。

⁴⁹ 《借债以开铁道说》，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⁵⁰ 《铁道论》，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⁵¹ 《借债以开铁道说》，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以振兴商务，必然是“取日增之利，偿岁减之息”。⁵²在上述思想的基础上，他提出一个借用外资来振兴商务的全盘计划。他主张创立一个专管借用外资、办理商务事宜的商务衙门，由商务衙门向外国贷款，然后由商务衙门“讲求土货”、“仿造洋货”、“开采宝藏”，按三大事，即金矿、织布、丝茶，“先易后难，次第分办”，并且“岁取其息以还洋款”。⁵³他认为，“如是数年之间，即可转贫民为富民，民富而国自强”。⁵⁴由此可见，他把借用外资兴办商务看作是实现“民富国强”的途径。在当时，马建忠将借用外资同“为民谋生”之说联系起来，是难能可贵的。

再次，坚决抵制外资入侵。马建忠在提倡利用外资时，也坚决反对西方列强的经济入侵，强烈抗议诸国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他既反对外国大小商贾直接投资办厂，以剥我工商，也反对洋商入股合伙办企业。他的看法是，“合股”比起“借债”来，弊大于利。他还举出土耳其修铁路时，英、法等国入股，结果受其控制的例子。因而，马建忠十分明确的提出，中国建筑铁道不可招洋股。这些观点在当时确实有抵御外资入侵的积极意义。在马建忠看来，利用外资，只有借洋债这一种办法。即使是举借外资，马建忠认为，也要注意防止外商的经济渗透。他认为中国借洋债有三种办法，如向政府借款、向银行商业贷款和向私人借款等。马建忠反对向外国政府告贷，提倡向国外民间商人货银行商业借贷。因为借贷于外国政府，就会受其要挟，还可能会附带政治性或经济掠夺性的条约或先决条件，所以，马建忠把民间私人借贷和银行商业借贷看成是“足以臻美善而绝流弊”的借债途径。⁵⁵对于向银行告贷还是向民间私人告贷，马建忠倾向于后者，因为“银行利重，民间利轻”。⁵⁶所以，马建忠认为，最佳的借贷方式是，自己派人到国外，径向民间借款，“由我计息”，“由我定价”，以杜绝外人“居间把持之弊”。⁵⁷

⁵² 《铁道论》，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⁵³ 《富民说》，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3页。

⁵⁴ 《富民说》，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4页。

⁵⁵ 《借债以开铁道说》，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页。

⁵⁶ 《借债以开铁道说》，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

⁵⁷ 《借债以开铁道说》，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页。

由此可见，马建忠为如何在防止外资入侵和渗透的前提下借用外资真是颇费心机。尽管他的主观愿望十分积极，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晚清社会里，他大多数的主张和建议是难以实现的。

最后，合理利用外资。马建忠把借债与用债区分开来，认为借外债用于什么是决定此举是否有利的关键问题。他说“借贷之事，用之善，则国受其利，不善则反受其害”。所以，他指出，“告贷之先，当筹所以告贷者所办何事，兴何善举”。⁵⁸他明确的提出，借用外债“不可行之于军务，必不可不行之于商务”。⁵⁹因为借外债用于军费等非生产性的开支，无任何盈利或收益加以补偿，反而加重人民负担，这就更使“国穷财弊”。所以，马建忠反对军务外债的态度是十分坚决的。马建忠也反对为赔款而举借外债。这种外债纯粹是一种资金的再流出，更有甚者，其数额巨大，足以使外人由此而控制我国财政和经济命脉。基于上述看法，马建忠认为，“债者，所以剂盈虚，通有无，与市易之道并重。”⁶⁰马建忠把借用外资兴办商务提到并重于国际贸易的高度来认识，认为利用外资是在一定条件下，正常的调剂盈虚、互通有无的国际间经济交往和联系。从当时来说，他能看到这一点确实是很有见识的。

第二节 外交思想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性先进性矛盾统一的双重性特点，决定了中国近代对外关系面临着双重任务：既要反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又要学习对手的长处。近代维新思想家对此，均有比较清醒的认识。马建忠是早期维新思想家中最早到国外攻读近代国际公法与外交理论的人才。相对于同时代的改良主义思想家而言，马建忠的外交思想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概括而言，可分为外交政策、外交人才和近代外交理念三个部分。

一、外交政策

1、“递交不可无，而择亦宜慎”⁶¹

⁵⁸ 《东行初录》，中国历史研究社编：东行三录，上海：上海书店，1982年版，22。

⁵⁹ 《富民说》，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4页。

⁶⁰ 《借债以开铁道说》，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4页。

⁶¹ 《巴黎复友人书》，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6至167页。

马建忠认为，在水陆交通发达、世界性交往势不可挡的近代，敦睦外交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须的。主张化被动的交往为主动的开放。他认为开放交结的益处有三：经济上，通过开放，可“因其利而利之，以广我利源”，⁶²“以对外贸易刺激国内兴利事业的发展，从而使我国富民殷，并逐渐达到收各国之利权的目的。文化上，通过交流，可以学习西方的长处，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外交上，通过与外建交，一方面，可见邦交之谊，消除国与国之间的敌对情绪，使本国在国际上不孤立；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可以利用合法手段据理力争，为国家在国际上争权益、争地位，反对他国对己国利益的损害。

马建忠不仅主张敦睦外交，且主张结盟。他说，“天下事众擎则易举，孤掌则难鸣；理之常也。夫同宅寰中，此疆彼界而建为国，则必小事大，大事小，忧危与共，战守相援，而势乃不孤。”⁶³除此以外，马建忠认为结盟还有使第三国不助敌国的作用。目的是为腾出手来，打击最主要的敌人。马建忠还进一步指出，结盟的参加者越多，其约束的范围就越广；作用就越大：“夫会者，所以结同盟之信，盟之者众，则信益彰，而守益愈笃。”⁶⁴反之，其约束力越小。如对范斯法尼之会，他就认为其“相维之势足以联络数国，不足以统属欧洲也。”因为它“只属数国之私盟，而非列邦之公约。”⁶⁵马建忠认为：如果出于策略的考虑，在必要时与他国结盟是可行的，但与谁结盟，选择“宜慎”。因为近代外交的实质是恃强凌弱，惟利是图，“利在则友，利亡则寇”。⁶⁶弱国与他国结盟，尤要警惕主权的丧失和为他国所制。他以土耳其结交不慎，时而附俄，时而亲法，时而私英，导致丧权辱国的教训，说明结盟宜慎。

⁶² 《巴黎复友人书》，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

⁶³ 《巴黎复友人书》，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6页。

⁶⁴ 《巴黎复友人书》，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页。

⁶⁵ 《巴黎复友人书》，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至164页。

⁶⁶ 《巴黎复友人书》，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页。

2、“外交之际，内政为先”⁶⁷

马建忠所处的时代，边疆危机迭起，四面临敌，防不胜防。面对列强咄咄逼人的攻势，如何理智地把握国家命运，是每一个外交思想家必须回答的问题。马建忠既反对畏葸胆怯，屈膝求和，该战不战，错失战机；也反对盲目作战，孟浪生事。他认为战与和的问题是关系到国家对外政策重大抉择问题。如果不顾主客观条件制约，不讲求策略和手段，一味求战，虽可泄一时之愤，但终将于事无补，甚至会给国家民族带来更大的灾难。他对当时只会逞一时意气的官僚士大夫们根本不了解世界局势和“人己之长短”，放言高论的“虚骄盲战”之气十分不满。他说：“今之论者则不问可否，不计成败，惟战是求。至问其所以能战，所以求胜之具，亦不过掇拾三代之遗文，补葺汉唐之故事，以为区区之论可鞭倭而答英法”，“师船尚未备也，则哗然而起曰，何不一逞于东；将士尚未练也，则又哗然而起曰，何不一逞于西。局外之誉议横生，则局中之牵掣日甚。今日辟一议，明日进一辞，阅数十年仍无成效，抑何不思之甚哉？”⁶⁸马建忠在民族义愤高涨的情况下，能够审时度势，保持清醒头脑，不顾世俗之毁誉，主张战和的选择要根据敌我力量的实际，以国家民族的最高利益为转移，这在当时是经过理智思辩得出的结论。

马建忠通过对近代历史的总结，深刻认识到外交与内政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在强调外交重要性的同时，马建忠还理智地看到，外交上的得失取决于国力的强弱。没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外交活动就失去了依凭，就不可能弘扬国威，难以在国际交往中维护本国利益。中国处于一个以均势为生存原理，讲求实力，弱肉强食的近代世界，所面临的是来自欧美，拥有近代物质文明和先进坚船利炮的入侵者，在这种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要避免被侵略、掠夺、沦为殖民地的悲惨命运，其出路只有一条：认清形势，励精图治，改革自强。马建忠主和的目的也是为了给内政改革创造一个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马建忠提出的保持和局，为内政改革提供有利环境的观点，在当时要担当舆论风险，但确实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的明智主张，是利国利民的策略之举。尽管由于清政府的顽固和腐朽，马建忠的建议未被重视；作为先行者，他也为时人所不容，但却体现了他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

⁶⁷ 《东行续录》，中国历史研究社编：东行三录，上海：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47页。

⁶⁸ 《上李伯相复议何学士如璋奏设水师书》，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0至201页。

二、外交人才

西方国家往往把运营机制健全的外交制度的形成,视作近代外交的开端。制度方面的内容,不仅包括设立主管外交事务的中央官署,实行外交机构的专业化,派遣常任驻外使节和设立常驻外国领事馆,同时还包括外交人才的养成和使用的制度化。马建忠就是晚清提出专业化培养外交人才方案的第一人。

要与外国打交道,离不开打交道的人,而人的外交才能如何,对交涉结果有直接影响。马建忠认为,时代不同,对使才的要求也不同,其总的趋势是越来越高;而使才最基本的才识是“达变以应时”,⁶⁹也就是能够根据时代的不同,情况之各异,作出相应对策。这与其“因时递变”的外交观点一脉相承。他还进一步指出,使才不仅要具备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能在实践中灵活运用,做到“理用兼备”。⁷⁰为此,马建忠提出了严考校、精培养、重禄丰的选才、育才、用才三位一体的使才得用观。

马建忠主张,要让使馆没有滥竽充数之辈,出使人员不会辱没使命,就要严格选拔,精心培养。为此他特别建议,设立正规出使学堂,以培养能够“达变应时”、“理用兼备”,具有国际眼光的近代专业化外交人才。具体主张是:收录粗通四书五经,年龄在15到20岁之间,身家清白的聪俊子弟,每年录取十人,以三年为限。第一年“课以法国、拉丁语言”,第二年“课以文义”,第三年“课以词章”。特别难得的是马建忠还提出教授的课程不应仅仅局限于语言,还必须同时讲解外国历史,以及“度数之学,格致之功”,并且兼修“华文史鉴”,不得偏废。每年考核一次,优胜劣汰,三年后综合考试,仍是择优录取,被录用者皆试用一年,合格者可以赴巴黎使署学馆继续深造二年,学习公法、律例、条约、理财、赋税以及各国交涉往来公牍。他说:“三年文字,约以学规以闲其心志,一年试用,宽其约束以观其自守。且三年文字之后,复令闲养一年,使凡年少气盛,狂傲不羁之习,借使馆之差委以销磨变化之;而后二年之功,专习西学,宽立期限,严督课程;得以虚心下气,成就可造之品,而免滥用之弊。”虽然经过这样严格考核,精

⁶⁹ 《巴黎复友人书》,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至165页。

⁷⁰ 《巴黎复友人书》,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页。

心培养出的青年才俊，只有“什之三而已”，但是“不出十年”，则会“风气开而士习变”，不但“使署无才难之叹”，而且“或可内调以参国政”。所以马建忠说“树人之功，即在十年以后，亦何惮而不为哉！”⁷¹

与此同时，马建忠还注意到了外交人才的使用问题。提出要使外交能悉资熟手办理，免遭人愚弄，必须“重禄俸以养其志”。使外交人员安心工作，老于其职。若是使员的费用省，“厨付不丰”，势必交游不广，无法及时知彼，从而危及国家利益；如是靠取给于家，则会“杜寒微之士”，使有志者窘于财力而求进者少。所取不够，势必滥取，其结果是“开幸进之门”，影响使才的素质。马建忠认为，如果通过严考校以防幸进，精培养而添其识，重禄俸以养其志等办法，遇有重大外交事件，便有知变应变之才，“足以折服众人之意气，而捍卫吾国之利权”了。⁷²

马建忠建立正规出使学堂的建议和他后来提出的设立翻译书院的主张一起，为近代外交和翻译专业人才的系统培养提出了一套较为切实可行的方案，这在近代中国实属创见。由于清政府财政拮据，马建忠深恐他的建议将会因经费问题而长期搁置，甚至筹划好了两处学堂费用的来源，“不妨由各使馆严剔幸用之人之薪俸以济之，是则国家无费财而有实用。”⁷³可惜清政府仍未采纳。但是他独到的集选才、育才、用才三位一体的使才得用观和择优录取、理用兼备、国内与国外培养相结合的育人方法对今天仍有参考意义。

三、近代外交理念

马建忠是近代传播西方外交理论的先驱。他在一系列著作中，不仅比较详细地输入了各种西方近代外交理论，还在实践中积极运用，从而推动了中国外交的近代化。马建忠所介绍和引进的西方外交理念，内容包括三个方面：(1)国际公法的历史和价值；(2)国家主权观念；(3)国家均势理论。

马建忠在《巴黎复友人书》中，详细叙述了公法的产生及其发展的历史。

⁷¹ 《玛赛复友人书》，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5至177页。

⁷² 《巴黎复友人书》，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

⁷³ 《玛赛复友人书》，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7页。

他说：“泰西政教肇自西腊，而罗马踵之”，⁷⁴但在希腊时期，外交还未产生；外交之道正式产生于罗马时期；至“范斯法尼之会”（即威斯特伐利亚公会），“均势之局大定”。交涉之道，焕然一新；再至“维也纳之会……分四等使者以明各行人之礼，其所以维系欧洲之均势者周且密矣。”⁷⁵马建忠指出，在近代国际法的演变中，威斯特伐利亚公会及其签订的《威斯特法尼亚和约》标志着以国家主权观念、国际法原理和势力均衡原则为主要框架的近代欧洲国际秩序的形成。而维也纳会议确定了外交使节的等级制度和优先地位，从而使国际外交事务纳入正规。马建忠除了介绍国际公法演变的历史之外，还积极地评价了公法的作用。他强调，中外交涉时一方面要“假公法以求全”，另一方面又要认识到国际法在对待弱小民族时表现出的软弱性、虚伪性和不公正性。马建忠说：“泰西之讲公法者，发议盈庭，非说理之不明，实所利之各异，以致源同派别，分立门户，上下数十家，莫衷一是，于是办交涉者，不过借口于公法以曲循其私。”⁷⁶因此，马建忠认为一纸虚文的国际法根本不足以维持国际和平与主权国家的独立，而国家的强弱才是维持国际关系和国际地位的根本依靠。

马建忠对西方的国家主权和国家平等观念的吸收与引进集中体现在要求修改不平等条约、重征进口税等问题上。1879年，英国为中外官交涉仪式和洋货免厘问题提出修约要求。马建忠建议抓住这个绝好机会，解决两个主要问题：第一，税则问题。按照国际法，凡是世界之内的各个国家，无论是强大或者弱小，是自主还是藩属，无不有自定税则之权。但由于清政府不熟悉西方惯例，也没有充分认识到关税自主权的重要性，因而自1842年《南京条约》订立后，中国实际上是放弃了这一主权。马建忠修改税则的主张，实际上是要通过修改不平等条约，以政府的税收政策为杠杆，调节进出口货之比率，限制外国商品的输入，保护国内工商业的发展，达到收回利权的目的。第二，关于我国行政主权问题。根据国际惯例，一国派遣的驻外使节须得到接受国的同意并颁给同意接受的文书，如果接受国认为派来的使节不合适，

⁷⁴ 《巴黎复友人书》，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0页。

⁷⁵ 《巴黎复友人书》，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2至163页。

⁷⁶ 《巴黎复友人书》，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页。

可以拒绝接受。马建忠把这一国际惯例告知李鸿章，要求外国“领事到任当奉批准，然后由译署咨本省督抚行知该领事，该领事于奉到批准之日方可视事”，“借此以戢其跋扈之势”。⁷⁷在此之前，清政府并不知悉这一国际惯例。马建忠的这一介绍，对于当时中国争取行政主权具有积极的意义。

马建忠还把维护国家主权独立的手段即均势理论引进到中国。所谓均势之法，就是使强国均平其势，不恃强凌弱，而弱国得以获得安定的环境，如此就能得到天下太平的结果。马建忠在《巴黎复友人书》中，首次准确使用“均势”一词，详细阐述了西方的均势理论及其演变历史和价值。在此之前，国内虽有与“均势”原则“名异而事同”的“合纵连横”之说与“以夷制夷”策略，但这两个概念是基于传统的“天子”权威和“天朝上国”观念下的术语。而“均势”原则则是在接受西方近代国家主权平等的国际观念下所使用的外交政策与策略，不可同日而语。如何维护主权国家之间的和平与国家主权独立，马建忠提出的对策是，运用结盟原则。不过，在纷纭复杂的近代国际局势面前，结盟固然重要，但选择与谁结交尤宜谨慎，所谓“第交不可无，而择亦宜慎”。

马建忠对西方近代外交理念的引进与介绍，为改革中国传统的外交体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观念的支持。他对西方近代外交理念的接受，充分反映了超越时人的胆识，为当时清朝当局处理外交事务提供了重要参考。

第三节 海防思想

作为洋务运动的积极参与者，马建忠对中国近代海军建设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早在留学法国期间，马建忠就译编了《法国海军职要》一书，对法国近代海军制度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这是马建忠对于海军建设的重要贡献。1882年10月末，翰林院侍讲何如璋提出水师事宜六条上奏。马建忠读到何如璋奏折后，举一反三，借题发挥，草成《上李伯相复议何学士如璋奏设水师书》。在这份奏折中，马建忠提出了十分丰富的海防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重要方面：

⁷⁷ 《复李伯相札议中外官交涉仪式、洋货入内地免厘禀》，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7至208页。

一、重视海军体制和制度的建设

马建忠在对何如璋奏疏进行评议时,开宗明义就肯定了何氏强调设立水师衙门“诚深得整顿中国水师之要领”。⁷⁸但马建忠主张设立水师衙门,并不仅仅是为解决分区设防与统一指挥的问题,而是从海军的特点功能及作战需要等多个方面出发的。他认为,海军事务专业性强,技术难度大,头绪繁杂,“精而推步测算,粗而升火添煤”,任何一门学科技术和工作都不能没有;海军的器械品种众多,精巧细密而难于掌握,“小自绳索水管,大至帆樯炮位”,缺一则不能有效发挥其功能。正是由于海军的这种专业性、技术性,分工细致、人才密集的特点,不设立专门的机构进行统一管理,“必至精粗大小之事纷无纪律,则虽有人有船而用违其才,与无才同;器不适用,与无器同。平时无以振声威,临事无以济缓急”。⁷⁹

马建忠将水师衙门的职能界定为“职掌机要,总决庶务”。⁸⁰常设办事机构有五司:军政司、典选司、广储司、粮糈司、会计司。要选拔干练正直之员任其事。马建忠还特别强调,要把海军专业化的人才不断充实到水师衙门中担任管理职务,以代替外行领导,提高办事效率。五司之外,还拟设立议事处和稽察使。前者为咨询机构,研究各种有关方针政策,稽察使的任务则是到各地考察了解情况。马建忠认为,建立了这样的水师衙门,就可以“纲举目张”,海军的发展就有了保障。

马建忠为整个海军建设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框架。比如除了水师衙门的组成外,还有如海军教育制度,海军军官士兵简选、管理制度,舰队组成制度,军械生产制度等。其中海军官兵简选、管理制度尤为详尽具体。马建忠还参照法国近代海军制度,提议设立中国海军军官官制,以改变中国重文轻武的传统。对于高级军官,可以仿照都统、副都统和长江水师提督的先例,既可派武官又可派文官担任。凡海军官员的一切规模法度,都按照级别相当的文官办理,去除轻视武官的成见。⁸¹马建忠认为,此举可以鼓励优

⁷⁸ 《上李伯相复议何学士如璋奏设水师书》,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8页。

⁷⁹ 《上李伯相复议何学士如璋奏设水师书》,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8至179页。

⁸⁰ 《上李伯相复议何学士如璋奏设水师书》,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页。

⁸¹ 《上李伯相复议何学士如璋奏设水师书》,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6至187页。

秀人才努力进取。立下战功、成绩卓著者，可赐蓝翎、花翎、勇号，准食翎奉、勇号俸，以示优崇。马建忠认为建立近代兵制的关键，是改招募制为兵役制。兵役制以五年为限。对那些一贯工作勤奋，从未犯过大过失的人，可以派到沿海各机器厂充当保卫人员。⁸²关于“恤赏”制度，马建忠建议参照法国海军条例并仿照中国海关华人放差七年后多给一年薪水之例，凡是服役五年的士兵多给半年口粮，服役十年的多给一年口粮，远洋航行两个年头以后准许请假三个月，并在休假期间领取一半口粮。拟请设立孤儿学堂，凡因公受伤或因公死亡的，准许他们的子弟入学。⁸³

在舰队编制方面，马建忠也有具体构想。首先必须对舰船进行编制。19世纪中叶，西方国家的海军舰队构成已相当复杂和齐备，有进攻的铁甲舰，有迎战的快船，有防御的防卫舰。马建忠建议，在购置这三类军舰时，应因地制宜，随机应变。鉴于清政府当时已初步建成广东、福建、南洋、北洋四支海军，舰队已划分了基地，马建忠建议各口岸隶属的舰只可以采用鱼贯阵和雁行阵，编队一起训练。⁸⁴这种舰队训练是培养和提高舰队官兵的应变能力及战斗意识，进一步熟练各项战斗技术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提高海上指挥和整体配合的主要手段。此外，平时军舰巡洋或海上相逢也应组成队伍行进。

中国海军的制度建设，直到1888年，才产生了一部《北洋海军章程》。⁸⁵马建忠所提出的各种制度，比《北洋海军章程》早出了六年多。其中涉及的一些基本原则和主要概念，对李鸿章等决策者及《北洋海军章程》的制订者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提高海军教育水平和将士地位

马建忠认为海军建设中，购置战舰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造就人才。前者价值再高，只要有钱，就可以定期建造或购买，而海军人才的造就，则非一日之功、“若水师将士，非招募可集，非立谈可至，自入学至管驾，竭

⁸² 《上李伯相复议何学士如璋奏设水师书》，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0至191页。

⁸³ 《上李伯相复议何学士如璋奏设水师书》，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2页。

⁸⁴ 《上李伯相复议何学士如璋奏设水师书》，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7页。

⁸⁵ 《北洋海军章程（节选）》，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472至504页。

力以求，少则十年，多至十余年，方可称职。”⁸⁶当时中国除福州船政学堂外，只有北洋创办了天津水师学堂，刚刚招收学生一年多，海军人才的需要与培养能力之间差距很大。为此，马建忠对海军教育与训练作出了整体设想。按照马建忠的设想，海军教育分为学校与练船两种。

马建忠建议仿照西方国家的有关规定，在沿海重要城市设立水师小学，专门选取十四、五岁的儿童入学。入学一年后，由水师衙门派员到小学考试，达到规定程度的，送入大学院深造。大学院设在水师衙门附近，学制二年，内设各科，包括英文、几何、三角，以及初步的天文、地理等。此外，适当选读中外史籍以扩充其知识。两年后考试，选择其中 30 名优秀者送到训练船上，专门学习驾驶。选派外籍人员教授观测天文、推算经纬度，使用仪器，演习使帆、掌舵等技术等知识、技能、两年后再考试，考取者派入各舰。在此基础上，再挑选其中精通数学的 10 名，专门学习制造，挑选学习医学的 5 名。这些人在完成船课的训练后留在大学院，分科讲授，继续升造。学制造的为考工生，派入各厂专攻工艺；学会计的为支应生，派入各舰担任稽查核对，兼习公法，日后负责文案；学医的为医学生，派入医院实习，日后充作海军专门医生。⁸⁷

练船分 3 种。一为学生练船，建议设在旅顺口，舱容为 80 余人，每年由大学院考送 30 人，毕业后到舰上担任最低级的驾驶系列的军官。二为兵卒练船，于广东南澳、福建北馆、浙江定海、辽宁旅顺各设一艘，每年各就近招募 15 岁以上合格青年 400 人，训练一年后，每船考招 300 人派入各舰充下卒，4 舰共录用 1200 人。三是卒长练船，设于旅顺。上述派入各船充下卒者，以次考升中卒、上卒后，由各舰选送到舰，总数在 100 名以内，训练 6 个月后再考选约 80 名，分派各舰充当副炮长、副队长、副艺长，优异者还可留作兵卒练船的教习。⁸⁸

马建忠主张大学院进行分级培训，堪称中国近代海军教育史上第一人。这一主张，既可缓解海军建设急需人才与人才成长周期长的矛盾，又可使海

⁸⁶ 《上李伯相复议何学士如璋奏设水师书》，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 180 页。

⁸⁷ 《上李伯相复议何学士如璋奏设水师书》，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 181 至 182 页。

⁸⁸ 《上李伯相复议何学士如璋奏设水师书》，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 183 至 184 页。

军教育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按马建忠的计划，九年之后，约可造就佐领一级的人才 200 人，卒长 500-600 人，精卒一万余人。现有的佐领、管领一级人才，再加以淘炼淬励，已可以升任管领、督领了。⁸⁹造就这样一支官兵队伍，才是中国海军发展壮大根本大计。

马建忠认为，对海军将官必须实行特殊的激励政策，因而请求“别立名目，稍崇体制”，⁹⁰即提高海军将官的地位。中国有重文轻武的传统，海军官员多属武职，因而地位不高，“甚至有以数年充当管驾之员，一二语与长官齟齬，立受杖责，反不如从九、未入班者”。⁹¹西方国家并不如此，而是武重于文。原因是西方制度武职必须能文，而文职未必能武。武官文武双全，所以地位较高。特别是海军，品级一般比相当的文官和陆路武官高出一等。中国海军初创，要想延揽兼通文武的人才，“则品级宜加详定，恩礼宜极优崇，方足以昭激劝”。⁹²他具体建议，督领可定为一、二品，管领可定为三、四品，佐领可定为五、六品；文武可以转升，位至督领者，仿照都统、副都统与长江水师提督之例，可以文武兼放，有外交才能的督领还可以充任出使大臣。所有海军官员的一切待遇规格，均按品级相当的文官办理。这样海军官员有了品级，文武又可转升，则轻视武官的成见就可破解，“则异人杰士莫不踊跃奋兴，而人材不可胜取矣”。⁹³他还指出，如果把海军人员与“持弓挟矢之流”等量齐观，不仅将来不会造就出智勇兼备的海军将帅，就是现在刚开始兴办的水师学堂也将无人报考。“盖彼将用其才力，专为帖括、章句、小楷之技，以攫高第而列显秩，又谁肯入学堂、练船，攻苦四五年，航海数十年，仍不免笞杖之辱哉！”马建忠把提高海军地位看作是“转移风会之枢纽，厘正水师之关键”，⁹⁴所谓“转移风会”，就是要造成尊重科学、尊

⁸⁹ 《上李伯相复议何学士如璋奏设水师书》，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 185 页。

⁹⁰ 《上李伯相复议何学士如璋奏设水师书》，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 186 页。

⁹¹ 《上李伯相复议何学士如璋奏设水师书》，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 186 至 187 页。

⁹² 《上李伯相复议何学士如璋奏设水师书》，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 187 页。

⁹³ 《上李伯相复议何学士如璋奏设水师书》，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 188 页。

⁹⁴ 《上李伯相复议何学士如璋奏设水师书》，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 188 页。

重人才的风气。有了这样的风气，中国才有望建设起一支足够强大的海军。

三、积极筹措资金发展中国海军

近代中国要创办海军，不但需要人才，还需要大笔经费。如果没有这笔经费，中国海军的发展就会受到很大阻碍。据马建忠推算，包括买舰。造舰。新建工程、将领、士兵的粮饷、兴办学堂等各项费用，清政府每年在海军建设方面大约应该投入白银五百万两。照九年计划，总计约需四千五百万两，⁹⁵由于清政府无法拿出这笔巨款，为此，他设计了一系列筹集经费方法。马建忠具体建议从四个方面筹款：(1)鸦片包销，堵塞鸦片烟每年二万箱的漏税，征税额由每箱 30 两提高至百余两，每年可增加 1000 余万两；(2)征收水旱烟税(含罌粟税)，每年至少亦可收得 2000 余万两；(3)改革金融，铸银元，可节约火耗至少 200 至 300 万两，发行纸币，可盈数千万两；国际上银价日贱，对外交易参用金币，每年可暗中减少至少千万两的损失；(4)开办邮政局，以代替旧式驿站，既可省经费，便官商，还能增加部分税收。⁹⁶马建忠所提出的筹款办法，是通过改革金融税收与兴办实业增加国家收入的办法，这与洋务派的其它自强主张是一脉相承的。

马建忠深知，他的筹款办法必然遭到顽固派的攻击，“不曰殊乖政体，即曰有碍成例”，“甚有指议行各事无非亡国所为，今若立地创行，日后流弊滋甚”。马建忠驳斥这些顽固派说，天下无有利无弊之事，“知有利而因循坐误，则利源日消；知有弊而立法预防，则弊窦自绝”。⁹⁷他还引证西方国家的情形，说西方国家的税收，如比附中国历史上的情形，无一非“亡国之政”。但他们却“民生日裕，国有益饶”。原因何在呢？就在于西方国家是“取于民者还为民用。民有利不能生，即以所取者生之；民有害而不能去，即以所取者去之。立法无中保之弊，涓滴归公。盖上下之情通而君民一体之道得焉”。⁹⁸在这里，马建忠温和地触及到了中国不能富强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建立起通上下之情而使君民一体的民主体制。

⁹⁵ 《上李伯相复议何学士如璋奏设水师书》，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1页。

⁹⁶ 《上李伯相复议何学士如璋奏设水师书》，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2至203页。

⁹⁷ 《上李伯相复议何学士如璋奏设水师书》，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3页。

⁹⁸ 《上李伯相复议何学士如璋奏设水师书》，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4页。

在《上李鸿章书》中，马建忠提出了一个中国海军发展的九年规划，即：九年之中训练将领 300 人，训练兵卒万余人，购制军舰 40 余号，建设军港要塞 5 到 6 处。这是一个使中国海军进入世界前列的十分宏伟的计划。马建忠对实现这一计划充满了信心，认为：“本三年求艾之深心，为十年教训之远略，未有不能称雄海上者。”⁹⁹但是，马建忠也深知，从上到下很多人对发展海军缺乏信心。这主要是因为，近代海军本来是英、法等西方国家的专利，而且英、法等国致力于海军建设数百年，才有现在这样的辉煌成就。所以人们难免发生疑问：像德国那样专心致力，俄国那样地大物博，创建海军经过了四五十年时间，还不敢与英、法争长，要说中国能在九年后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称雄海上，不是痴人说梦吗？对此，马建忠认为，中国不必跟在西方的后面爬行，中国可以迎头赶上，与西方的差距是可以跨越的。他举例说，西方国家的轮船由利用帆力而改用蒸汽机，大炮由前膛炮改为螺旋膛炮，今人使用蒸汽轮船，不必再去学习利用帆力；使用螺旋膛炮，也不必再由前膛炮学起。从而得出结论说：“此谓善作者未必善成，而善因者易于善创也。”西方国家是善作者，未必能够坚持其优长，中国如果善于接受先进经验，比西方的发展要容易得多。马建忠这里所讲的，就是中国的后发优势问题。“中国当此初创，席其智谋，祛其胶固，其能事半功倍也何疑？器械精者仿而用之，不必问其为德为英；章程善者采而行之，不必问其为中为外。”¹⁰⁰中国可以综合学习各国的智慧、经验、器械、制度，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又可以避免他们在发展中形成的“胶固”——因囿于已有经验、固步自封而产生的弊端，所以能够事半功倍，取得至今人们仍在提倡的跨越式的发展。在当时能有这样的认识，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马建忠的海防思想具有突出的特点。他不像一般人那样笼统地、大而化之地议论海防问题，而是抓住一些海防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结合西方先进国家的经验，联系中国的实际，具体而深入地进行分析。他也不像一般人那样主要从器物的层面或技术的层面谈论海防，而是着重从思想的层面、制度的层面、教育的层面和管理的层面立论。因而，他

⁹⁹ 《上李伯相复议何学士如璋奏设水师书》，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 200 页。

¹⁰⁰ 《上李伯相复议何学士如璋奏设水师书》，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 200 页。

关于海防建设的观点，能发人之所未发，能详人之所不详，更加触及到海防建设的本质，更加具有可操作性，也更加系统和完整。尽管他的大多数思想都未能付诸实施，但是他积极地为晚清海军的近代化献计献策，体现了一位改良主义者对国家军事发展的关注和为此付出的努力。

第四节 地位和评价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马建忠的改良主义思想是十分丰富的。但是，如果把马建忠的思想与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作比较的话，可以发现他的思想有个重要的特点，即是经济思想的极为丰富和政治思想的极端缺乏。马建忠对发展商业以及经济改革方面情有独钟，却闭口不提政治制度的改革。这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有其内在的深层原因。

首先，出生在东南沿海一带商人家庭的马建忠，从小就受着商人言利思想的熏陶。清中叶以后，沿海地区工商业的发展已经极为兴盛。尤其在苏南一带，商品生产和贸易观念逐步形成，这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重农轻商的传统思想。这种状况对于重商言利思想最初在马建忠的观念中形成，无疑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青年时期，到达上海后，马建忠亲眼目睹了西方资本主义侵入后给上海带来的繁荣。跨出国门，面对的又是整个经济发达的西方世界，难怪马建忠认为西人以利为先。出身于东南沿海，使马建忠对资本主义经济入侵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有着更深刻的体会。在他看来，外国商品的侵入，不只是破坏了中国以家庭手工业为主的传统经济，更为重要的是，造成进口货多于出口货，使得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这才是中国民穷财尽的根本原因。马建忠从抵制外国商品侵略出发，强烈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扭转外贸逆差。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马建忠对政治并不热心，他感兴趣的是如何发展经济。

其次，这也与马建忠在留学期间对欧洲国家政治制度的了解与洞察有很大的关系。马建忠到欧洲一年多就指出，西方政治制度虽“议院立而下情可达”，但也有其弊端。对此，马建忠指出：“英之有君主，又有上下议院，似乎政皆出于此矣，不知君主徒事押签，上下议院徒托空谈，而政柄操之首相与二三枢密大臣，遇有难事，则以议院为借口。美之监国，由民自举，似

乎公而无私矣，乃每逢选举之时贿赂公行，更一番监国则更一番人物，凡为官者皆其党羽，欲望其治，得乎？法为民主之国，似乎入官者不由士族矣，不知互为朋比，除智能杰出之士如点耶诸君，苟非族类，而欲得一优差，补一美缺，戛戛乎其难之。诸如此类，不胜枚举。”¹⁰¹

从以上马建忠对英、美、法等国议会政治的批评与分析看，实行议会政治并不一定能包医百病，治理好所有社会问题。这就难怪马建忠对政治制度的变革兴趣不大了。当然，马建忠所言亦不无偏颇。实质上，马建忠还没有深刻认识到政党政治的底蕴，不能理解西欧政治是以政党对立为前提而谋求政治统一的，更不能深刻体会到西方议会政治的基点是平等原则、代议制、选举制等民主的原则。

马建忠的改良思想不够完善，在政治思想上的保守性，使他的思想远远落后于与他同时代的郑观应、薛福成等人。另外，对李鸿章的感恩心理也束缚了他的思想进一步发展。而且，在留法回国后，一直从事的都是具体的活动，没有时间从事思想上的总结。所以我们今天研究的他的思想大多是他在留法期间的思想，后来思想上的发展如何无法体现，这也许是他的思想落后于当时其他思想家的另一个原因。马建忠的思想的影响力远远不如同时代的改良主义思想家，也部分由于他的地位一直不高，始终是以李鸿章幕僚的身份参与活动。

此外，马建忠改良主义的倾向与主张散见于其日常的函札、著述中，大都因事而发，应时而作，暴露出了理论上的贫乏与不足。而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应的。从马建忠所处的历史阶段来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还刚刚兴起，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艰难地挣扎，缓慢地发展。民族资产阶级还是襁褓之中的婴儿，力量非常幼弱。马建忠作为这个新兴阶级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改良主义思想的先进性与局限性，都是与这个新兴阶级的不成熟状况相适应的。

十九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日益发展的变法维新思想，开始针对奠定传统权力结构的旧政治价值合理性提出了质疑。尽管主观上大多数改良派均主张和缓渐进而不触动旧权力结构的根本，但他们对旧价值体系的迷茫和动摇，

¹⁰¹ 《上李伯相言出洋功课书》，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9页。

构成未来风暴的潜在能量。七十年代王韬、马建忠、薛福成等人虽未直接涉及加固旧权力结构解体的价值体系,但其后的郑观应,陈炽等人已身体力行。由此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使马建忠等人的改良主义思想虽然不够完善,但他们毕竟是近代中国系统的向西方学习的先进知识分子。与魏源、林则徐等人相比较,是前进了一步的。后来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维新思潮,也是在他们的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说,马建忠的改良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

第四章 马建忠交游的重要人物

马建忠一生交游非常广泛，但是最值得探讨的只有三个重要人物。一位是他的上司兼恩师——李鸿章；一位是他的同胞哥哥——马相伯；一位是他忘年交的学生兼朋友——梁启超。马建忠与这三人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相互之间的影响也十分深远。

第一节 马建忠与李鸿章

马建忠受知于李鸿章，他一生的活动皆与李鸿章密切相关。从他步入仕途，到退出官场，一生的荣辱沉浮都在李鸿章的阴影之下。终其一生，他从未在晚清政府获得任何一个实缺官职，始终都是在李鸿章的幕府中，以李鸿章的幕僚身份活动。

长兄马建勋进入李鸿章幕府帮办淮军粮台，成为马建忠结识李鸿章的契机。1870年，马建忠与教会发生冲突，一怒之下愤而离会。马建勋向李鸿章推荐了弟弟马建忠。当时李鸿章刚上任江苏巡抚，急需充实幕僚人才为其所用。马建忠由于在早年曾参加科举，又有在教会学校的学习经历，所以成为中西文兼通的不可多得的洋务人才。李鸿章非常欣赏这个年轻人，于是将其招入幕府，马建忠开始了作为李鸿章幕僚的生涯。

在李鸿章幕下襄办洋务初期，马建忠参与处理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马嘉理案”。1874年，英国为了入侵我国西南边防要地云南，派遣军官伯郎(Browne)率领武装“探路队”约二百人从缅甸出发，由陆路潜入云南边境，企图打开缅甸和云南之间的“通路”。英国驻华使馆为了配合这次入侵行动，委派翻译官马嘉理(A.R.Margary)由云南进入缅甸接应。¹⁰²1875年2月，马嘉理在没有事先通知清政府和云南当局的情况下，擅自带领伯郎(Browne)为首的“探路队”以“游历”为借口，从缅甸进入云南边境到处乱闯。在蛮允附近，马嘉理(A.R.Margary)一行遭到当地少数民族百姓的愤然阻击，本人被击毙，伯郎(Browne)及其“探路队”被逐回缅甸境内。¹⁰³

¹⁰²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90页。

¹⁰³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90页。

这一事件被英国政府利用，企图借机扩大事端，对清政府大肆要挟，恣意讹诈。于是，英国公使威妥玛(Wade)开始向清政府提出交涉。清政府为了息事宁人，同意与威妥玛(Wade)交涉。但“威妥玛(Wade)不欲回津，李相不允赴沪，乃折中而有烟台之约。”马建忠、薛福成等人随行襄理，作为谈判的智囊。谈判桌上，中外双方少不了一番唇枪舌剑，此次李鸿章却应付裕如，底气十足。实际上，在此之前，马建忠已将中外情势及交涉之公理一一说与李鸿章，再加上马建忠间以十分流利的法语，援引西方外交之公理法则作佐证，李鸿章当然镇定自若。因此，谈判虽然不无反复，但中英双方最终还是达成一和谈结局，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事后，“威妥玛(Wade)约文忠登英兵轮观操。其时，吾人于外情尚未深悉，且先有叶名称登轮一去不返之鉴深入人心，从者咸请辞谢。文忠毅然而往，不稍游移。临别，威妥玛(Wade)握着李鸿章的手说：‘吾今服矣。’”刘体智在《异辞录》中最后评价道：“文忠此举固有定识，而随员中丹徒马眉叔，通达中外情势，颇有翊赞之功。”¹⁰⁴烟台谈判，马建忠出色的表现，博得了李鸿章的赏识。李鸿章更生出栽培马建忠之意。

光绪四年（1878年），清政府派驻英公使郭嵩焘兼任驻法公使，此时马建忠正在法国巴黎学习。正月二十六日，李鸿章写信给郭嵩焘，向他推荐马建忠，称“马郎中建忠，志趣尚好，人亦聪明，法文法语俱精，现在官学讲习交涉律例，可备就近驱策，倘能兼翻译又不误所学，则两益矣。”¹⁰⁵七月二十七日，清政府任命曾纪泽继郭嵩焘出任英、法钦差大臣。九月初八日，曾纪泽由北京至天津，拜访北洋大臣李鸿章，相谈极久。在那里，看到了马建忠的《上李伯相言出洋功课书》，极为激赏，甚至将此信抄录在自己的日记中，还在日记中写道：“闻建忠年才二十有六，精通法文，而华文函亦颇通畅，洵英才也。”¹⁰⁶

光绪五年（1879）五月二十二日，英国公使威妥玛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交涉中外往来仪式及洋货进入内地免收厘金等事，总理衙门致函李鸿章，请他代筹对策。李鸿章又将总理衙门函件抄送马建忠，命他代筹。马建忠递交《复李伯相札议中外官交涉仪式洋货入内地免厘禀》，称：“中外交涉以来，

¹⁰⁴ 刘体智：《异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70至71页。

¹⁰⁵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8）》，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5页。

¹⁰⁶ 曾纪泽：《使西日记（卷1）》，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

西人两次构衅，借势凭陵，乘我仓卒之时，要我立约，…故领事则优如公使，税则则轻于各国，我方徇章守约，无缘启齿，今何幸难端先自彼发，正可引起相要者，我据公法以争之，使果如愿以偿，诚不至自封故步，即或所议不恰，亦不过仍守旧章。”¹⁰⁷

当时，洋务运动正在进行中，李鸿章准备筹建铁路。马建忠得知此消息后，依据他在法国学习两年所获得的西学知识，写了两篇关于铁路的文章提供李鸿章参考。这两篇文章中分别是《铁道论》和《借债以开铁道说》。在第一篇文章中，马建忠说铁道对于“军旅之征调，粮饷之转输，赈济之挽运，有无之懋迁，无不朝发夕至，宜乎铁道所通，无水、旱、盗贼之忧，无谷贱钱荒之弊”，¹⁰⁸因此对于中国来说，修筑铁路是谋求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而对于财政拮据的清政府来说，不可能拿出这样一大笔钱来投资，于是马建忠提出一个办法，即《借债以开铁道说》。在这篇文章中，马建忠认为中国要修筑铁道，官款拮据而且民气未开，只有先借洋债以解决资金问题。第一次可先筑一条由天津至北京的铁道用来提倡，“则他日考求西学，小儒不至咋舌，清议不至腾口”¹⁰⁹，马建忠的这些见解，对于李鸿章处理铁路问题是一种有益的借鉴。

马建忠于光绪六年（1880年）三月回国，至天津拜见李鸿章，呈现在法国先后应考所得五次官凭，李鸿章逐加考询，认为他华学既有根底，西学又有心得。六月初三日，李鸿章上《奏保马建忠片》，奏称：“候选道马建忠前经臣调津随办洋务，精通法国语言文字，兼习科举之学，志趣端正，心地明敏，颇堪造就，派往法国留学，出洋三年，勤学好问，周历法国、英国、德国、奥地利、瑞士、比利时、意大利等国，闻见博洽，又兼出使大臣郭嵩焘、曾纪泽翻译官，历著辛劳，今学成而归，自应照案酌给优奖，请准加二品衔，并交军机处、总理衙门存记，备充出使各国之用。”¹¹⁰这是李鸿章第一次正式向朝廷保荐马建忠。

¹⁰⁷ 《复李伯相札议中外官交涉仪式洋货入内地免厘禀》，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5至206页。

¹⁰⁸ 《铁道论》，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6页。

¹⁰⁹ 《借债以开铁道说》，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1页。

¹¹⁰ 《奏保马建忠片》宁波，杨嘉敏主编：李鸿章全集（3），长春：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8至1499页。

光绪七年（1881年）四月，马建忠奉李鸿章之命前往旅顺，堪察了海港的地理形势和修筑炮台、船坞等项工程，了解当地居民以土法淘金、开采煤矿的情况。当年他即上书李鸿章全面陈述了自己对于兴办海军的一些设想。这些意见对于李鸿章倡办北洋海军、构建北洋海防极具参考意义。六月二十三日，李鸿章派马建忠前往南洋，访办鸦片事件。马建忠先后至香港、西贡、新加坡、加尔各答、孟买等地，与英国谈判，他认为“鸦片流毒，中外腾谤，当寓禁于征，不可专重税收。时英人持正义者，亦以强开烟禁责其政府，引以为耻，闻建忠言，虽未能遽许，皆称其公。”¹¹¹

光绪八年（1882年）春，受李鸿章委派，马建忠以特派大员的身份先后两次赴朝，参预美英德等国与朝鲜订立通商条约。同年八月二十日，奉李鸿章之命，马建忠、周馥等人与朝鲜大臣赵宁夏、鱼允中在天津订立水陆贸易章程八条，由北洋大臣派总办朝鲜各口商务委员会驻扎汉城。¹¹²八月二十九日，李鸿章在《奏保丁汝昌马建忠片》中奏称：“马建忠足智多谋，熟悉公法，能持大体，历办朝鲜与美、英、德议约事宜及此次朝鲜善后各务，均为远人所敬服，实堪胜专对之选，拟请赏戴花翎，并垦特恩以海关道存记擢用。”¹¹³这是李鸿章第二次上书请求朝廷重视马建忠的外交才能，授予他办外交的权力。九月一日，朝廷奖励朝鲜出力人员提督吴长庆、丁汝昌，道员马建忠等人。但是不久之后，清流派官员张佩纶就指责马建忠对日韩之间的条约负有责任；清廷下令李鸿章等查明此事。十月，李鸿章上《查复马建忠参案折》，对马建忠被弹劾各条逐一加以解释，这充分表明了李鸿章对马建忠的维护态度。

当时法国武装侵略越南，即将挑起中法战争，马建忠随李鸿章左右，曾在李鸿章办公的签押房外另辟一室，供马建忠和同在幕府的盛宣怀居住，“以应不时之召”。¹¹⁴光绪八年（1882）十月，李鸿章派马建忠与宝海商订越事办法三条，不久总理衙门复函李鸿章，同意马建忠所商订之办法。¹¹⁵光绪九年（1883）正月二十九日，李鸿章收到马建忠自上海来电，得知法国驻华公

¹¹¹ 赵尔巽等：清史稿（第41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482页。

¹¹²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00页。

¹¹³ 《奏保丁汝昌马建忠片》，宁波、杨嘉敏主编：李鸿章全集（3），长春：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51页。

¹¹⁴ 刘体智：异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24页。

¹¹⁵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02页。

使被法国新任内阁撤职，立即转告总理衙门，命云南、广东、广西驻军严申警备。¹¹⁶光绪十年（1884）四月初四日，马建忠在上海会晤法国总兵福禄诺。¹¹⁷次日，李鸿章电马建忠，令转告福禄诺，中国驻法公使曾纪泽已撤职，请法国停兵。四月十一日，马建忠陪福禄诺自上海至天津。次日，李鸿章与福禄诺议定中法简明条约。四月十七日，中法简明条约正式签字。¹¹⁸同一天，李鸿章上《奏保马建忠片》，奏称：“臣前因二品銜候选道马建忠从前游学法国，与其官绅相处，熟知情伪，令在上海侦访敌情，福禄诺过沪时就商一切，该道晤水师提督利士比，密囑以福禄诺赴津讲解，必须开诚致敬，若带兵船前往大沽，略露要挟之状，臣必不愿商办，利士比等恪遵指示，福禄诺仅坐一帅舰北来，过烟台后，复换搭商轮赴津，此即廖寿恒所奏先令兵船退出口岸之意，深合大体。该道同时回津，帮同臣往复辩论，颇得刚柔操纵之宜，遂能克期成议，实该道之力居多。查八年春夏，叠经派往朝鲜，主持美、英、德各国议约之事，条理精详，嗣朝鲜内乱，复委令带队前往弹压处理，应手奏效，奉旨记名以海关道用，旋经吏部以章程不符议驳。此次定约，竭诚相助，不激不随，动中机要，维持大局，其劳绩尤不可泯。该道贯讲中西各学，心地谨饬，才能肆应，西人多引重之，若蒙恩存记，擢授关道及出使之任，必于交涉要务有裨。”¹¹⁹这是李鸿章第三次正式向清政府举荐马建忠，希望能授予他一个实缺官职。然而当时清政府内部的“主战派”责骂李鸿章对法求和的政策，指责马建忠的对法交涉属于“屈辱”行为，李鸿章的保荐当然不能得到清政府的认可。

同年七月初六日，清廷调马建忠往总理衙门办事，这实际上是“主战派”试图阻止李鸿章与法签订和约，因为马建忠是李鸿章外交的得力助手。七月二十三日，李鸿章又上《奏留马建忠片》，称马建忠因“熟悉洋情公法，办理尚能妥慎，现值战守机宜吃紧，侦探、转运均关重要，一时难更生手，致有贻误，拟请暂缓北上，俟军务稍松，再行给咨来京。”¹²⁰事实上，当时朝

¹¹⁶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06页。

¹¹⁷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33页。

¹¹⁸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34至736页。

¹¹⁹ 《奏保马建忠片》，周殿龙，孙素云主编：《李鸿章全集（4）》，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909至1910页。

¹²⁰ 《奏留马建忠片》，周殿龙，孙素云主编：《李鸿章全集（4）》，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959页。

野盛传朝廷将以“卖国”罪名诛杀马建忠，为了维护马建忠的安全，李鸿章以探听法军消息为由将马建忠留下，其实是对他的一种保护措施。

十三年（1887），清廷命李鸿章筹办漠河金矿，李鸿章请马建忠与盛宣怀、李宗岱迅速筹议，各抒所见，保荐结实可靠、熟悉矿务干员和殷实商董，妥议试办章程。马建忠向李鸿章递禀，论漠河开矿事宜，建议议成兵淘金，有偷挖金矿者，亦招之入伍，以兵法部署之，不劳役，不费财，可固防，可制敌，内以戡匪徒之出入，外以杜强邻之窺伺，不数年间，边备益修，军储益裕，当务之急，莫要于此。¹²¹

李鸿章对马建忠的重用与日俱增，马建忠早已升至招商局会办，似乎就要取代盛宣怀的督办而代之，深为盛宣怀所忌，他拉拢与马建忠素不和睦的另一个会办沈能虎，共同与马对抗，马建忠请李鸿章委招商局会办严濂为织布局提调，盛宣怀立即请李鸿章收回成命。接着，盛宣怀再命沈能虎向李鸿章控告马建忠将公款五万两存入旗昌洋行，用“马建忠”私人名字；及旗昌倒闭，又偷改为“轮船招商局”字样，此外，还“挂欠公帐一千三百六十余两。”李鸿章在盛宣怀等“严峻陈词”，多方敦促之下，始“偶为所动，暂令眉叔离局清理侵挪各款。”¹²²十七年八月，马建忠贯彻自己的计划，扩充纺织业，欲借银百万两，另设一个织布局，盛宣怀又请李鸿章加以阻止。李鸿章此时也认为马建忠“办事一味空阔，未能处处踏实。”¹²³马建忠得不到李鸿章的继续支持，上海织布局筹款困难，谤声四起，只好将织布局总办一职也让给了杨宗濂。¹²⁴

从此马建忠在晚清官场上的活动基本上告一段落，但是他与李鸿章的幕僚关系并未彻底结束。二十一年（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李鸿章被迫代表清政府与日本代表伊藤博文在马关签订屈辱条约，马建忠作为参赞参与了条约的签订。二十六年（1900年），爆发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清廷任命李鸿章为全权议和使臣，由广州北上。李鸿章于六月二十五到

¹²¹ 《上李伯相复议漠河开矿事宜禀》，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3页。

¹²² 夏东元：《盛宣怀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6页。

¹²³ 《复沪局马道》，顾廷龙，叶亚廉：《李鸿章全集（一）电稿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4页。

¹²⁴ 林言椒，苑书义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二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3页。

上海，命马建忠入行辕襄理。俄来数千字长电，声称中国若不承诺，即封锁吴淞，马建忠连夜译出，急甚，以热病大作，于七月十二日（8月14日）去世，终年55岁。¹²⁵至此，马建忠在李鸿章幕府的幕僚生涯告终。

李鸿章对马建忠的赏识、提拔、重用，说明了他对马建忠的才华的认可。马建忠对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认识远远超过李鸿章，李鸿章处理中国外交、经济、军事问题屡次向马建忠咨询，马建忠协助李鸿章办外交，颇显才干，办理轮船招商局等企业，也有相当贡献。李鸿章欲马建忠出任海关道，或担任驻外国公使，清朝政府未满足他的要求。李鸿章欲马建忠办理企业，马建忠又与盛宣怀等互相水火。李鸿章权衡利弊，认为马建忠不如盛宣怀、杨宗濂踏实、稳健，于是将其逐出招商局。

李鸿章对于自己的手下虽然比较维护，曾为马建忠多次上奏保举，又为使他避祸而申辩，但是他最终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考虑的。为了使自己避免灾祸，他也会使马建忠充当替罪羊，正如他在招商局事件中所做的那样。所以，马建忠一生在宦海中的荣辱悲欢，都是操纵在李鸿章手中的，这是所有幕僚的共同命运。

第二节 马建忠与马相伯

马相伯、马建忠兄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对传奇人物，他们出身于天主教家庭，曾代表清廷出使朝鲜，除杰出的外交才能外，他们都有极深的语言学造诣。马建忠是晚清外交界和商界的风云人物，在他退而著述时，写出了中国现代语法的奠基之作《马氏文通》。马相伯是复旦大学创办者，之后他又和英敛之在北京创立辅仁大学。在著名的“七君子”案中，马相伯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尊敬。

一、兄弟二人在朝鲜事务上的活动

马氏三兄弟均与洋务派领袖人物李鸿章有知遇之恩。就在马建忠出国前一年，马相伯也因前述之原因离开了教会，凭着长兄马建勋与淮系官僚的特殊关系，顺利的进入了政界。光绪二年（1876），马建勋介绍马相伯至山东布政使余紫垣处掌理文案。不久，余紫垣署理山东巡抚，又委马相伯接办山

¹²⁵ 张若谷：《马相伯先生年谱》，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204页。

东潍县机器局，制造军火。¹²⁶同年，李鸿章派马相伯调查山东矿务，马相伯在交卸潍县机器局差使后，又勾留山东半年。¹²⁷恰在此时，远在山东的马相伯听说弟弟马建忠被选派到法国留学，自然十分高兴。马相伯在山东三年间，正好是马建忠留学法国时期。在马建忠留学归来后一年，即光绪七年（1881）三月初七日，清政府派道员黎庶昌充出使日本大臣，马相伯随黎庶昌赴日，任驻日使馆参赞。不久，改任神户中国领事。马建忠在朝鲜的外交活动前文已经叙述，而马相伯在朝鲜的顾问活动却没有提及。实际上，马氏兄弟二人在朝鲜问题上的遭遇是紧密相连的。

1882年9月12日，朝鲜高宗政府派遣谢恩兼陈奏使赵宁夏一行，到天津向当时实际上主管清政府对朝政策事务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有关内政外交改革的《善后事宜六条》。其中第六条的“扩商务”部分提出拟开放商埠并设立海关以开展对外经济贸易，要求清政府给予相关制度规程乃至人员方面的支持。同年11月12日，再次奉命使华的赵宁夏一行在天津向李鸿章提交了朝鲜国王高宗的咨文，内称：“窃小邦向不谙外务，而各国换约在前，一切交涉商办事件，茫然不知下手，烦请贵大臣酌量小邦应行时宜，代聘贤明练达之士，迨兹东来，随事指导。”¹²⁸

当时，朝鲜方面希望清政府委派曾帮助朝鲜高宗政府签订《朝美条约》并主持镇压“壬午兵变”的马建忠前去。李鸿章以马建忠“在此公务甚繁，不克分身……暂难前去”为由，拒绝了朝鲜方面的要求，另外推荐马建常（即马相伯）赴朝，说“中书马建常熟悉公法、洋情……人甚耿直，会商诸事，必无欺饰”。赵宁夏已在天津见过马建常，因称马建常“老实明白，已钦服矣”。他回国后“亦告马建常之明白熟谙外洋公法之由于国王矣。若与他同往商办，不胜万幸。”¹²⁹原本属意于马建忠的朝鲜方面能够欣然接受李鸿章的劝告与推荐，最终同意在马氏兄弟之中“舍弟而取兄”，应该说与赵宁夏等朝鲜使者的上述良好印象直接有关。

在11月15日上光绪皇帝的奏折中，李鸿章汇报说，“查有候选中书

¹²⁶ 张若谷：《马相伯先生年谱》，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117页。

¹²⁷ 张若谷：《马相伯先生年谱》，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124页。

¹²⁸ 《代朝鲜聘西士片 附件：朝鲜国王来咨》，宁波、杨嘉敏主编：《李鸿章全集（3）》，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60页。

¹²⁹ 《总署收署北洋大臣李鸿章文 附件四：光绪八年十月初二日与朝鲜大官赵宁夏笔谈节略》，郭廷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卷）》，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版，第1038至1041页。

马建常，系道员马建忠之胞兄，向曾游学欧洲，谙习公法、洋情，明练耿直，前经出使日本大臣黎庶昌调充理事，适暂假来津。臣因马建忠为朝鲜君臣所信服，亦荐令同赵宁夏前往，随事襄筹妥办，可资得力。”¹³⁰奏折中所谓“向曾游学欧洲”之语，显然是李鸿章为提高马建常的身价而故作夸大之辞，因为马建常虽自12岁起开始接受西方神学及近代西方文化教育，并先后从事教育、矿务、外交等事务，却迟至1886年47岁时才有奉李鸿章之命赴美借款的欧美之行。李鸿章于奏折中不顾“欺君”之嫌而为马相伯“编造学历”，固然表明他对马相伯期许颇高，同时亦可见晚清官场腐败之一斑。

李鸿章因遭母丧于1882年初请假返回安徽合肥“守制”，后来于八月返回天津，而马相伯因马建勋患病而回国，至南京拜见李鸿章，李鸿章命他随至天津。鉴于马建勋、马建忠早已成为李鸿章亲信幕僚的家族背景，马相伯本人曾受李鸿章委派调查山东矿产的经历，加上李鸿章“不居常礼而寒暖与共”的格外礼遇，马相伯舍弃驻外领事之职而入李鸿章幕府，并受命代替弟弟马建忠成为清政府驻朝鲜的顾问，应该说是顺理成章之事。

马相伯作为朝鲜国顾问，所做的第一件事是编练新军。他建议朝鲜政府改用西洋操法训练军队。第二件事，则是整理外交。他在朝鲜目睹了西方外交公使对中朝外交官员的轻视，所以总是设法以自己渊博的知识，以及对国际时势的洞察力，来压倒那些高傲的西方外交公使，树立朝鲜的权威。马相伯还不辞劳苦，下去了解朝鲜民情，他起草了《上朝鲜国王条陈》，提出九条具体建议，请朝鲜政府仿照日本明治维新，推广仁政，发展经济与教育事业。马相伯的忠心耿耿，赢得了朝鲜国王夫妇的信任与好感，闵妃把希望寄托在太子身上，她想请马相伯亲自教太子。马相伯见太子没事就伴着宦官宫妾斗鸡走马，便提出应让他去外国留学。他说日本一旦进兵高丽，中国若不能抵御，太子必为阶下囚。闵妃深表赞同，但彼邦政府暮气沉沉，任凭马相伯怎样鼓动，其所条陈的应兴应革事宜，真正施行时总是大打折扣。马相伯见其积习难除，知不可为，回天津述职，不愿再去，并向李鸿章推荐袁世凯，建议早定政策，或听朝鲜自主，或派钦差率兵前往，作有力的指导。李鸿章说：大清国我都不敢保它有二十年的寿命，何况朝鲜？¹³¹

¹³⁰ 《代朝鲜聘西士片 附件：朝鲜国王来咨》，宁波、杨嘉敏主编：李鸿章全集（3），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60页。

¹³¹ 马相伯：一日一谈，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8至29页。

二、米建威计划的共同活动

米建威 (Mitkiwig) 计划, 即近代中国较早开设银行的一次未成功的试验活动。在这个活动中, 马相伯和马建忠兄弟不分彼此, 共同为这个计划努力奔走, 并同样承担了巨大的社会压力。

最早这个计划的缘起是马氏兄弟和李鸿章的一场对话。李鸿章对马氏弟兄发牢骚, 说: “军机处命我办海军, 只给我五百万两银子, 怎样能办的好?” 马氏弟兄就建议说: “现在有美国大富商可以借钱给我们, 中堂为什么不试办一下?” 李鸿章听完, 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便问他们要借多少? 马氏兄弟说, 至少要五千万才能有发展的希望, 李鸿章听说要这么大的数目, 连忙摇头说: “二千万吧。”¹³²他们进而与李鸿章商量道, 借洋债确不容易, 一来利息轻重常受挟制, 二来镑价涨落复多亏损。针对这样的情况, 马氏兄弟又向李鸿章建议, 何不多借款项来开设银行? 李鸿章同意借款二千五百万两, 先开设银行。1887年8月16日, 由美商米建威 (Mitkiwig) 及美人费城企业组合巴特 (Bulter) 与马建忠、盛宣怀、周馥秘密商谈, 决定中美合资组织银行, 资本4千万两。以2千万作为开发中国、统一币制、发行纸币、整顿中央及地方金融、建设铁道、整理黄河、安置电话等方面投资。中方以李鸿章为代表, 美方以钢铁大王范得比 (W.H.Vanderbilt) 为代表。¹³³马建忠、周馥、盛宣怀均先后加入了这个该公司。《华美银行简明章程》签字后, 米建威便起程“回国禀商, 译议章程并筹集款项”。马建忠原拟与米建威同行, 去美筹措所需股份资金, 但因有事一时分不开身, 马相伯于是又一次作为马建忠的替身前往美国, 与美国政府、金融界洽谈借款事宜。马相伯临行前, 曾建议李鸿章最好将此事奏明清政府, 但李鸿章不以为然道: “难道我一个北洋大臣又兼理通商大臣, 连与外国商人商订借款的权柄都没有了吗? 你去好了, 我打电报给美国大总统。”¹³⁴正因为李鸿章这一行为后来引起了清政府的不满, 所以计划最终流产可能与这件事有一定的关系。

马相伯一行作为李鸿章的代表在欧美受到了极好的贵宾待遇。在纽约, 马相伯除了应酬之外, 便和美国的大银行家商量借款事宜。这些大银行家觉得由李鸿章这样一位拥有实权的清朝重臣出面主持筹开华美银行, 此计划一

¹³² 马相伯: 一日一谈,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9年版, 第42至43页。

¹³³ 龚宗一: 《李鸿章年(日)谱》, 台北: 台湾文海出版社, 1973年版, 第4971页。

¹³⁴ 马相伯: 一日一谈,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9年版, 第43页。

定能够成功，所以马相伯与二十四家银行经理洽谈，每家都争着要借款。不到一个星期，马相伯竟谈妥了五亿两的借款。马相伯知道借款数目太大，李鸿章不敢贸然答应。然而，马相伯又不便冷却美国银行家的热心，于是他就和美国银行家们商量；以五千万为正式借款，以三万万为他们（华美银行）的存款，存款以三厘计息，然后视中国对于财政的需要之缓急以为因应。美国银行家表示同意。当马相伯把这一消息电禀李鸿章时，李鸿章的回电竟是：朝议大哗，舆论沸腾，万难照准。马相伯十分为难，无法给热心的美国银行家一个交代，于是匆匆逃离美国。

原来，此次借款筹开华美银行的计划，主要来自两方面的阻挠。首先，华美银行简明章程披露后，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各国驻华公使公开出面，向清政府提出交涉。英、德等国强烈反对这个计划，因为这对他们的在华利益有很大影响。其次，当马相伯借款电报发到国内之后，则招来清政府内部顽固守旧派及平时就“疑忌”李鸿章的清朝王宫贵族们的一片责骂声。接着，八十一名御史联名上书弹劾李鸿章事前不奏请、事后不奏报的专断行为是“越俎代谋”、“欺君枉法”，骂他着了洋鬼子的迷，并连同马相伯和马建忠兄弟一块指责为“丧心病狂，要卖国了”。¹³⁵在里、外一片责骂声中，清廷严令李鸿章停止银行筹开的计划，并且对李鸿章步奏明请旨大为恼火，并令查问是否马建忠串通怂恿。李鸿章只得放弃，并电令马相伯中止一切商议，立即回国。轰动一时的筹建华美银行的米建威（Mitkiwig）计划至此彻底破产了。后来，马相伯谈及此事，仍然认为是平生最遗憾的一件事。可以设想，如果计划成功，中国在甲午海战中就不会因为没有坚强的海军而导致失败；中国的中央银行（大清户部银行）就不会推迟到1904年才试办开张。

在此次筹办银行的活动，马氏兄弟的命运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借债思想是马建忠的重要改良思想之一，此次活动可以看作他的一次实践，结果却以失败告终。马相伯从开始就和他的意见一致，共同向李鸿章建议。后来又作为他的替身远赴美国进行筹借活动，接着又和他同样承担了来自帝国主义列强和国内保守势力的压力。可以说，马相伯和马建忠在此次活动中是一对“难兄难弟”。

¹³⁵ 徐景贤编：《马相伯先生国难言论集》，上海：文华美术图书公司，1931年初版，第249页。

三、晚年合著《马氏文通》

1891年，马建忠被迫离开招商局。两年后，一场大火又焚毁了马建忠努力经营的织布局。悲愤之下马建忠离开李鸿章幕府，回到上海以著译从业。而此时的马相伯，在世俗社会历经二十年风风雨雨后，也终于感到世俗生活太累了。1893年，他妻子和儿子死于海难，两年后母亲也病逝。马相伯经过一番痛苦的思考，决心彻底脱离政界。他把两个尚未成年的子女托给教会保育，只身回到上海徐家汇土山湾，重新过起了隐修的生活。

马相伯、马建忠兄弟重又团聚在上海，他们获得了在学术上互相切磋的机会。这为马建忠日后完成他的语法巨著《马氏文通》提供了充分保证。难怪后来有人说，政治上的失意，对于马建忠个人来说是人生中的不幸，但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却是不幸中的万幸。对于语言学，马氏兄弟有着超常的天赋，他们不但精通英、法、德、意、西班牙文，而且还熟悉古希腊文、拉丁文等西方古典语言；当然他们更通晓中国的文史典籍和汉语言学。早在法国读书时期，马建忠就曾获得修辞学学位。其时让马建忠难以容忍的是，西方学者一直不承认中国有语言学，甚至连19世纪著名的汉学家博布和施来格也持这种观点。触发马建忠编写中国语法学著作的另一原因，是汉语学习的困难与低效。当时以拼音文字和白话文为核心的汉字改革运动正风起云涌，马建忠认为从拼音文字和白话文角度探讨汉字改革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对汉字语言科学本身的认识。当人们掌握了汉语的语法规律和规则时，其认识难度便会大大降低。马建忠决心要编写一部中国的语法学著作，他要向外国人证明，中国有非常严密的语法体系。马建忠以拉丁文语法为理论参照，结合汉语本身的特点，在吸收传统训诂学中有关虚、实词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系统的归纳总结，并且在词法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对句法进行较为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为了撰写这样一部著作，他平时读书，遇到较为特殊的语法现象的语句，常信手记下，作为研究的依据。所以马相伯后来称，《马氏文通》系马建忠“经二十年长期的记录”才写成的。¹³⁶

在马建忠撰写这部巨著时，马相伯正着手编订《拉丁文通》。这是一部专门以拉丁文法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对东西方语言学的共同兴趣和同样精深的造诣，使他们常常就一些汉语语法学的概念展开讨论，甚至连汉语语法的

¹³⁶ 张若谷：《马相伯先生年谱》，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199页。

内容及体系的确定，都是在两人切磋琢磨之下获得解决的。而且，马相伯还是弟弟最最苛刻的批评者，《马氏文通》初稿写成后，马相伯认为举例太多，有碍青年读者的脑力和时间。马建忠从心底里膺服，因此一下子删去三分之二。¹³⁷1896年《马氏文通》终于脱稿，全书总计十卷，分“正名”、“实字”、“虚字”、“句读”四部分。第一卷“正名”是对全书创立的语法术语和概念的诠释与界定。¹³⁸1898年商务印书馆刊行了木刻本前六卷；第二年秋，后四卷也正式刊行。几年间《马氏文通》的石印本、铅印本先后问世，印行达数十次，成为商务印书馆早期最畅销的图书之一。1902年绍兴府中学堂还将其作为新式学堂的正式语文教科书。不久经总理学务大臣审定，商务印书馆正式以学堂教材的名义出版了《马氏文通》。

第三节 马建忠与梁启超

戊戌前夕，康有为在北京创办强学会，梁启超与黄公度在上海创办《时务报》，配合康有为积极宣传变法。由他任主笔的《时务报》，成为引导思想界革命的先锋。正是在这一年（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马氏兄弟与梁启超相识。当时，梁启超担任主笔的《时务报》报馆与马相伯的寓所近在咫尺，而梁启超在《时务报》上撰写的那些笔端常带感情的激扬文字，引起了马氏兄弟的注意。梁启超对沪上西学通才马氏兄弟更是心仪已久，于是，他们很快成了忘年交。这一年，梁启超年仅二十四岁，马建忠四十八岁，马相伯五十三岁。除了康有为之外，马氏兄弟称得上是对梁启超产生影响的可数人物了。

戊戌前的上海，在一部分讲求洋务的开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个由所谓“洋务诸公”结成的群体，经常聚在一起纵言时事。马建忠的家常常是他们聚会的地方。这其中，既有洋务大员盛宣怀等，也有启蒙思想家严复、马氏兄弟、汪康年、黄遵宪诸辈。可以说，这里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摇篮之一。当时，因梁启超《时务报》报馆在英租界四马路，马氏兄弟住宅在新马路眉寿里，两处相距很近。因此，梁启超常常是马

¹³⁷ 马相伯：《一日一谈》，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

¹³⁸ 马建忠著，章锡琛校注：《马氏文通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页。

相伯兄弟的座上客。可以推测，梁启超的一些重要思想是在这里酝酿得到的。

关于梁启超与马氏兄弟的往来，主要情形是：“丙申七月，《时务报》出版，报馆在英租界四马路石路，任兄住宅在跑马厅泥城桥西新马路梅福里，马相伯先生与其弟眉叔先生同居，住宅在新马路口，相隔甚近，晨夕相过从。麦儒博于是年之冬亦由广东到上海，于仁兄及弟三人，每日晚间辄过马先生处习拉丁文。徐仲虎建寅、盛杏孙、严又陵、陈季同及江南制造局、汉阳铁厂诸公，輿乎当时所谓洋务诸名公，皆因马先生弟兄而相识。马先生以仁兄年尚少，宜习一种欧文，且不宜出世太早，其主张輿吴小村先生相同，谓黄公度先生为贼夫人之子。自丙申秋至丁酉冬，一年半而輿马先生几无日不相见。马眉叔先生所著之《马氏文通》，輿严又陵先生所译之《天演论》，均以是年脱稿，未出版之先，即持其稿以示任兄。”¹³⁹

梁启超与马氏兄弟成了名副其实的“忘年交”。这期间，马相伯几乎与梁启超无日不见。马建忠所著的《马氏文通》以及严复所译的《天演论》均在这时前后脱稿，梁启超则因为与他们的关系，而得以先睹为快。后来，有人指出梁启超的西方政治理论及西学知识，得力于马氏兄弟者甚多。这不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在此之前，梁启超在十七岁才第一次读到《瀛寰志略》，而以后从康有为那里获得的西学知识实际上相当支离破碎。

梁启超对西方语言文字的一窍不通也影响着他对外方政治学说及文化科学的接受。从年龄上说，马氏兄弟堪称梁启超的师辈。事实上，马氏兄弟一方面对梁启超的才华称赞有加，另一方面对他在学业没有成熟之前过早的卷入政治也表现出十分的怜惜。马相伯希望他趁早学习一门西方的语言文字，以原汁原味地了解西方政治学说、文化科学知识。于是，马建忠机决定承担起梁启超的拉丁文教职。与梁启超一起来学习拉丁文的，还有康有为的弟子麦孟华等人。

九月十二日梁启超给夏穗卿先生的信，其中提到：“弟近学拉丁文，已就学十余日，马眉叔且自愿相授，一年即可读各书，可无窒碍云。俟来岁相见时，君听我演说希腊七贤之宏旨也。”¹⁴⁰除了学习拉丁文及有关西学知识外，梁启超与马氏兄弟更像是朋友和同道的关系。马氏兄弟很少把梁启超当

¹³⁹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2003至2004页。

¹⁴⁰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2004页。

学生。他们在许多方面常常是相互交流，相互探讨。

同年（1896），梁启超为马建忠的《适可斋记言记行》作序。当时诽谤马建忠的很多，但梁启超却说：“闻马君眉叔将十年矣，称之者一，而谤之者百，殷殷愿见，弥有数年。今秋忽获海上合并，共晨夕饫言论者十余日，然后始霍然信中国之果有人也。…世之谤君者勿论，其称君者，亦以为是尝肆西文，履西域，接西士而已之人也。自命使西以来可斗量也。吾有以窥君之学，泰西格致之理，导源于希腊，政律之善，肇矩于罗马，君之于西学也，鉴古知今，察末以反本，因以识沿革递嬗之理，通变盛富强之原，以审中国之受弱之所在；若以无厚入有间，其于治天下若烛照而可见也。…每发一论，动为数十年以前谈洋务者所不能言；每建一议，皆为数十年以后治中国者所不能易。”¹⁴¹梁启超甚至著文慨叹，如果帝国当局早用其言，则中法、中日战争的结局可能就不一样了，这足见梁启超对马建忠的推重。

还在《马氏文通》写作过程中，梁启超就在《时务报》上对其著述情况作了披露：“余所见者，马眉叔近著中国文法书未成也。余昔教学童，尝口授俚语，今彼以文言达之，其不达者则削改之。初授粗切之事物，渐授浅近之议论。初授一句，渐三四句以至十句。两日之后，乃至三十句以上，几成文矣。学者甚易，而教者不劳。以视破承起讲，支支节节而续成者，殆霄壤也。若其条理，则俟马氏书成，可得而论此焉。”¹⁴²1898年，《马氏文通》正式刊行。梁启超又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重要著作中给予了高度评价。

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马相伯在上海徐家汇办震旦大学院。这时，梁启超正在日本，听说这消息，即在《新民丛报汇编》时评栏第八百十八页至八百二十三页，刊登震旦学院章程和功课预算表，并亲撰《祝震旦学院之前途》一文。文中有一段说：“吾闻上海有震旦学院之设，吾喜欲狂，吾今乃始见我祖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吾喜欲狂，该学院总教习为谁？则马相伯先生，最精希腊、拉丁、英、法、意文字者也。…士生今日，不通欧洲任一国文字，几不可以人类齿。而欧洲各国语学，皆导源拉丁，虽已通其一，固亦不可不补习拉丁，而先习拉丁然后及其他，则事半功倍，而学亦

¹⁴¹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记行（卷一）》，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1页。

¹⁴² 汪康年，梁启超等主编：《时务报（17册）》，台北：台湾华文书局进行，1967年版，第4至5页。

有根底焉。此马相伯、眉叔兄弟所素持之论也。眉叔云歿，士林痛惜，此学院即相伯所独力所创也。其愿力洵宏伟，其裨益于我学界前途者，岂可限量？”¹⁴³

不难看出，梁启超对于这位近代早期启蒙思想家的认识与评价已经超出了一般的老师和朋友的关系，也不再拘泥于他们在办理洋务、东西文化认识上所达成的共识。他理解先驱者的孤独，也理解作为启蒙思想家对民族和国家背负的沉重的使命。梁启超对马建忠的理解与认同远远超过同侪。作为一位时议颇多的洋务人物，马建忠觅得了一位真正的知音。

¹⁴³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2004页。

结 语

马建忠的教徒身份，使他得以进入西方教会学校学习，较早接触到西方的语言和思想文化。教会学校的教育让马建忠成为洋务派所需要的人才，并参与了学习西方先进军事技术和生产技术的洋务运动。在这场以“求强”、“求富”为口号的运动中，马建忠的改良主义思想逐渐发展成熟，成为近代中国的一名早期改良主义者。

从天主教徒到改良主义者，马建忠所走过的道路在同时代向西方学习的知识分子中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迅速变革的时代，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卷入社会变化的潮流中去，荣辱沉浮都与时代的发展息息相关。马建忠作为出生在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知识分子，必然处在纷繁复杂的矛盾冲突之中。他的身上有可贵的先进思想，也有传统社会留下的深深印痕。

一、教徒背景与官场失意

从明代利玛窦来华开始，马建忠的家族成员就成为天主的信徒。而在儒家封建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中国社会，这样的家族注定处于社会的边缘，注定要承受主流社会的排斥和挤压。对于家族成员来说，这样的家族背景，除了意味着被正统的士人视为异类外，最大的不幸，莫过于从此与仕宦之途绝缘了。从马建忠在晚清官场的沉浮可以看出，教徒出身的家庭背景成为他仕途上的一大阻碍。

由于康熙末年罗马教会改变利玛窦的传教方针，禁止教徒祭孔和祀祖，从而导致“礼仪之争”。自雍正时期起，清政府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播。天主教逐渐不为士大夫所接受，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中也鲜有信教者。鸦片战争以后，天主教传教士挟不平等条约，强迫解除对天主教的禁令，由此引起民众反感，更加为士人所不齿。而且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正是教案最多的时期，不仅上层社会，连一般民众也对天主教的印象也十分恶劣。在这种社会环境中，马建忠的教徒出身，无疑使他成为众人攻击的对象。

早年，马建忠虽然进入教会学校学习，并且也是耶稣会的一名修士，但当他认识到教会内部中外修士的不平等后，便无意做一名神父，而愤然脱离教会。当然，对于科举正途，马建忠也曾抱过幻想，但当他彻底认识到八股文的空疏、腐朽以及无用之后，即决定弃其所学，转而研习西学。他要以国家社会所需要的学问与知识去实现他的用世之志。马建忠既不甘心终生做一名身着长袍的修士，也不愿从科举之途上讨生活。

现实社会比马建忠想像的复杂的多。马建忠以为脱离教会就可以走出基督教家族文化的阴影，顺利地进入主流社会，但以后的事实表明，这只是马建忠自己心中的幻想。当时整个社会还是封建顽固势力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开放是极其有限的。而传统社会对于与儒家正统文化相抵触的天主教，从根本上说还是抵制的。马建忠在上海轮船招商局被免职，以及饮恨上海机器织布局，都可以看到传统社会对于天主教家族文化背景出身的马建忠，有一种深深的排拒心理。

从中法战争结束，到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作为李鸿章幕下一名专门处理对外交涉事务的干将，马建忠在此期间多次参与中外交涉活动，在一些中外交涉中还起到过重要作用。但弱国无外交，纵然马建忠饱读世界各国公法律令，精通国际交涉之惯例，拥有中外交涉之一流外语，但没有强大的国力做后盾，他及其同时代的外交家的命运也只能是一个悲剧。比其他同僚更为不幸的是，因为家族天主教的文化背景，马建忠一直被正统士大夫视为异类。即使在出使朝鲜时，为大清帝国保存了一些面子，但李鸿章的请奖折照样被总理衙门总署以种种借口敷衍过去。而一旦参与交涉的事务“有失国体”，马建忠即为千夫所指、万人所骂。他任上海轮船招商局会办期间所参与的“售产换旗”就是其中一例。

光绪八年十月十二日，李鸿章的《查复马建忠参案折》指出有人控告他说：“马建忠为天主教民，与沈惟敬同一市井无赖，恐蹈覆辙。”李鸿章辩解道：“该道幼习儒书，屡试不售，嗣游学泰西，兼习法文，本非教民，亦非市井。”¹⁴⁴后来与马相伯齐名的天主教界著名人士英敛之在撰写《与某公金正希奉教事》（收入《安蹇斋丛残稿》）时说：“读李合肥全集，有人奏参□□（按即马建忠）系天主教人，万不可用。李为之复奏云，□□□非天主教云。系天主教，非天主教，即以定人之邪正及可用与否，一何可笑！”¹⁴⁵由此可见当时社会对教民的厌恶程度。

马建忠后来的一些著作中，都未明确提及到他的教徒身份。这也反映了当他退出教会后，希望别人忘记他的这段过去。实际上，后人很难知道他与基督教的关系有多深、多久。十九世纪中国社会对于基督徒的责骂如此其甚，致使受过教育的中国教徒都尽量隐瞒自己的基督徒身份，尤其是希望能在仕

¹⁴⁴ 《查复马建忠参案折》，宁波，杨嘉敏主编：李鸿章全集（3），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7页。

¹⁴⁵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05页。

途上获得发展的马建忠。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仅见的资料看出，马建忠虽然离开了教会，但是教徒身份仍然没有改变。在他去世之际，上海著名报纸《申报》报道说：“今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傅相器之倚之如左右手马观察建忠本月初八日犹在行辕译紧要文牍，及午夜而返，渐有倦意，未几即气弱如丝，延至初十清晓六钟时，溘然长逝。观察素奉天主教，翌日家人依教规例殓。昨日晨祈北门外圣若瑟堂行追思礼。”¹⁴⁶从以上报道中可以看出一点，马建忠虽然很早就脱离了教会，但自始至终都未能摆脱天主教给他的影响。

在马建忠的官场生涯中，曾被李鸿章奏保多次，可见李鸿章对他的厚爱。但不幸的是，马建忠始终官运不佳，未能获得一官半职。造成这种情况，原因当然很复杂。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与明清以来注重门第出身、崇尚科举正途的社会风气有关。马建忠出身于天主教世家，早年就读于教会学校，虽博得洋功名，实际上在封建正统士大夫看来，这种功名实在不能与科举功名相提并论，因此，留学归来的马建忠尽管满腹新知，学有专长，一生也只能充当李鸿章手下的一个真正的杂役，而不能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独当一面。在近代中国，有此遭遇的不只马建忠一人，容闳、严复等接受过西方文化洗礼的开风气人物也始终处于社会的边缘。这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悲剧，而且也是时代的悲剧。

二、中西文化的矛盾

近代中国的大门是西方列强通过战争强行打开的，西方文化也通过战争、暴力和对中国的掠夺强行向中国输入。因此，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也是充满冲突的，这种冲突主要围绕三种矛盾开展，即殖民主义的侵略和中国人民反侵略的矛盾、西方工业文明和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矛盾、西方基督教文化和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的矛盾。而在马建忠的身上，这三种矛盾都有体现。他主张修改不平等条约、裁厘加税和抵制外资入侵等思想，表现了殖民主义的侵略和中国人民反侵略的矛盾；他主张发展对外贸易、建立近代外交制度和近代海军，表现了西方工业文明和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矛盾；而他与基督教的联系和所受的传统儒家教育，又表现了西方基督教文化和中国儒家文化的矛盾。尤其是在第三个方面，与当时其他向西方学习的知识分子相比，表现更为突出。

¹⁴⁶ 薛玉琴，刘正伟：百年家族——马相伯，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第176页。

马建忠出身于天主教世家，这是一个充满文化冲突的家族，因为天主教是完全不同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方宗教。自雍正禁教后，天主教一直处于秘密活动的状态。天主教徒受到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人的排斥，始终处于社会的底层。况且，天主教徒是隶属于教籍的，在地方上没有户籍，更使他们不能奢望融入大社会。后来有人弹劾马建忠“市井无籍”，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实际上，早在徐汇公学学习期间，马建忠就已经感受到了两种文化的冲突：一边是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一边是中国的儒家文化。而两种文化都深深地影响着他。

太平军进抵江南时，马家辗转逃到上海。那时，马建忠正在上海天主教会所办的徐汇公学就学，一面学外国文，一面“执笔学举子业”。江南科举考试的不克举行，阻塞了马建忠的进身之道。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马建忠鉴于外国侵略者以偏师北上，竟能迫使清朝政府屈服，有意“深求其得失之故”，才决心改学洋务。他追求西方知识的动机，是出于年青人朴素的爱国思想的；但一开始就限于希望有一天能代替那些“决口不谈海外事”的士大夫，而为“我朝”用。¹⁴⁷这说明，虽然马建忠是在天主教学校学习西方文化，同时也不忘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必走的道路，学习西方文化只是为了为更好的走上仕途。而且，一旦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发生冲突时，他所选择的仍然是走传统文化的道路。所以，他后来退出教会的举动，也不能完全理解为一气之下的冲动行为。实际上，他一直都未把天主教作为终身的事业，而天主教会的公正作法，就促使他放弃了继续从事教会事业的打算。

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提出了“基督教改革派”的说法，并把马建忠也归为这一类。他指出：“另一些基督教改革派，如王韬（1828—1897年）和马良之弟马建忠（1844—1900年），人们给予他们应得的评价是改革者，而不是基督徒。…这些人是早期摆脱了儒家藩篱的人。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基督教似乎并不能取代儒家的思想体系。毋宁说，它使人注意到这一事实：其他合法的和值得尊重的世界观都是可能存在的。一旦把这一点弄清楚了，儒家社会便第一次处于守势。这样我们就发现，甚至当基督教徒（或受基督教影响的）改革派保持对儒家学说的信念——事情也常常是这样的一——时，这种信念的性质已经有所改变。他们的推论似乎是，如果儒家学说要在中国继续占统治地位，它应该是与从前迥然不同的儒家学说。因此，需要

¹⁴⁷ 《自记》，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3页。

进行改革。”¹⁴⁸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改良主义思想家对待“中学”和“西学”的普遍态度。马建忠应该算是受过完整的西学教育的人。从带有西学背景的天主教家庭出身，到教会学校的西式教育，到中国早期留学法国的知识分子，马建忠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不可谓不深。照一般推理来看，他应该是十分崇尚西方文明的人。但是，我们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马建忠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远远超过西学。在他的眼里，西学知识是改革中国的工具。他虽然超出了洋务派的思想藩篱，但是仍然没有摆脱“中体西用”的圈子。对于马建忠来说，传统的儒家思想才是他的根本。从李鸿章对他的奏保中也可以看出，他是西学和中学皆通的中西全才。而正是这一点，才使得李鸿章对他格外赏识。

马建忠批评空谈“尊王攘夷”的守旧派，指摘洋务派垄断新式企业，主张扶持民间工商业。但是他始终缺乏相应的政治主张，在改良主义思想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1880年，他结束在法国的学习回到天津，由李鸿章的一般随员成为亲信幕宾，在将近十年的期间，撰文立说很少，从事实际活动较多。由于他对李鸿章存在一种感恩图报的心理，所以始终无法真正表达自己的思想。从政治舞台上退出后，1896年马建忠在上海和梁启超结识。梁启超很恭维他，鼓励他成一家之言以诤天下。他的《适可斋记言记行》就是在同年校订出版的。但是，马建忠和梁启超并未建立更深的关系，没有参与1898年戊戌变法中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行列。这说明他的思想其实仍然停留在维护旧有政治体系的范围内，不敢也不愿意进行政治上的改良。

由于马建忠同时具有天主教徒和儒家学者的双重身份，这使得他的人格也具有双重性。作为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马建忠在传统与现代之间，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他的一生都处在这样的矛盾中，而且也始终无法真正解决这种冲突。马建忠一生的思想和活动是晚清社会的一面反光镜，折射出个人在新旧社会大变革时代的独特影像。

¹⁴⁸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45至646页。

参考文献

一、马建忠相关著作

- 【1】 冯桂芬、马建忠著，郑大华点校，采西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 【2】 马建忠著，章锡琛校注：马氏文通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 【3】 马建忠著，张岂之、刘厚祐校点：适可斋记言，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
- 【4】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记行，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

二、史料与档案材料

- 【1】 曾纪泽等：使西日记（外一种），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2】 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
- 【3】 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4】 顾廷龙，叶亚廉：李鸿章全集（一、二）电稿一、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 【5】 李清悚，顾岳中：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教育侵略活动资料简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
- 【6】 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 【7】 钟叔河主编，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版。
- 【8】 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9】 唐小轩：李鸿章全集（2），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 【10】 宁波，杨嘉敏主编：李鸿章全集（3），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 【11】 周殿龙，孙素云主编：李鸿章全集（4），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 【12】 王学：李鸿章全集（7），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 【13】 李长仁：李鸿章全集（8），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 【14】 方豪编录：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稿（附：年谱），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
- 【15】 中国历史研究社编：东行三录，上海：上海书店，1982年版。
- 【16】 李楚材编著：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 【17】 朱有瓛，高时良：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1993年版。
- 【18】 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 【19】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
- 【20】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
- 【21】方豪编：马相伯（良）先生文集·续编·新编，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
- 【22】张若谷编：马相伯（良）先生年谱，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
- 【23】刘体智：异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
- 【24】马相伯：一日一谈，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 【25】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抄，杭州：杭州古籍书店，1986年版。
- 【26】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 【27】王伯恭：蝻庐随笔，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 【28】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 【29】郭廷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版。
- 【30】汪康年，梁启超等主编，时务报，台北：华文书局，1967年版。

三、专著

- 【1】（法）史世徽著，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江南传教史（第二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 【2】顾裕禄：中国天主教史的过去和现在，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 【3】郑洁，刘文鹏：李鸿章外交之道，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2年版。
- 【4】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5】桑咸之，林翘翘：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 【6】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 【7】苑书义：李鸿章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8】（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 【9】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进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 【10】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 【11】欧阳跃峰：人才荟萃——李鸿章幕府，长沙：岳麓书社，2001年版。
-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稿（第二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 【13】阮仁泽，高振龙主编：上海宗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 【14】林言椒，李喜所编：中国近代人物研究信息，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 【15】赵矢元主编：中国近代爱国者百人传，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 【16】林言椒，苑书义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二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 【17】 徐日晨，赵矢元主编：中国近代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 【18】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历史学系：中国近代史争鸣录（历史人物篇），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 【19】 吉林省历史学会编：中国近代爱国人物，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
- 【20】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
- 【21】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
- 【22】 赵尔巽等：清史稿（第41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
- 【23】 薛玉琴，刘正伟：百年家族——马相伯，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 【24】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 【25】 张后铨主编：招商局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
- 【26】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27】 夏东元：盛宣怀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 【28】 王如绘：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 【29】 夏东元：洋务运动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 【30】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 【31】 龚宗一：李鸿章年（日）谱，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
- 【32】 萧一山：清代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 【31】 赵靖，易梦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 【32】 石峻：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四、参考论文：

- 【1】 任静吾：马建忠在《适可斋记言》里所表现的思想，《光明日报》，1953年11月14日。
- 【2】 汤照年：试论马建忠的经济思想，《文汇报》，1962年7月20日。
- 【3】 杨炳延：论马建忠，《开封师院学报》，1964年01期。
- 【4】 陈宗海：强国之道的探索者——马建忠，《光明日报》，1983年10月26日。
- 【5】 黄清根：试论马建忠的富民思想，《文汇报》，1984年7月2日。
- 【6】 钟祥财：马建忠是晚期重商主义者——同黄清根同志商榷，《文汇报》，1984年9月17日。
- 【7】 黄清根：再谈马建忠的富民思想，《文汇报》，1984年11月2日。
- 【8】 林承节：马建忠、吴广霏的印度之行和他们的南行日记，《南亚研究》，1985年02期。
- 【9】 许有成：马建忠生平及其思想初探，《复旦学报》，1985年06期。
- 【10】 曹均伟：马建忠与利用外资，《上海经济研究》，1987年03期。
- 【11】 胡赤军：论马建忠的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的思想，《求是学刊》，1994年04期。
- 【12】 王双：近代沿江三家的商本思想——王韬、马建忠、薛福成经济思想探析，《河

- 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03期。
- 【13】俞政：论马建忠的经济思想，《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03期。
- 【14】谭群玉：马建忠的外交思想，《清史研究》，1996年04期。
- 【15】贾熟村：李鸿章与马建忠弟兄，《清史研究》，1997年03期。
- 【16】谭群玉，曹又文：洪仁玕与马建忠的维新思想比较，《历史档案》，1998年04期。
- 【17】石蕾：浅论马建忠的富民思想，《镇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01期。
- 【18】谭群玉：马建忠的外交活动，《中山大学学报论丛（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03期。
- 【19】张立新：论马建忠的对外经济思想，《德州学院学报》，2001年01期。
- 【20】蒋文野：马建忠生平专辩二题，《镇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01期。
- 【21】石蕾：马建忠的外交思想，《镇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01期。
- 【22】魏新生：略论清末马建忠引用外资思想，《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1年03期。
- 【23】石蕾：马建忠的外交思想评论，《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04期。
- 【24】薛玉琴：马建忠与近代中国海军建设，《史林》，2002年01期。
- 【25】石蕾：论马建忠的经济思想，《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04期。
- 【26】王如绘：试论马建忠的海防思想，《东岳论丛》，2003年01期。
- 【27】薛玉琴：马建忠对近代西方外交理念的接受与运用，《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05期。
- 【28】权赫秀：马建忠留法史实辨误二则，《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01期。
- 【29】任桐：晚清苏南改良思想群落的的地域成因，《江海学刊》，2001年01期。
- 【30】李天纲：耶稣会档案中有关马相伯事迹记录，《档案与史学》，1995年03期。
- 【31】权赫秀：马相伯在朝鲜的顾问活动（1882年11月—1884年4月），《近代史研究》，2003年03期。
- 【32】许金芳：幕僚与晚清外交，《安徽史学》，1997年02期。
- 【33】贾熟村：李鸿章与朝鲜，《安徽史学》，1999年04期。